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 December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2001年3月6日至9日

临时议程* 项目6(e)

不按领域分类的活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

统计委员会主席之友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1. 秘书长谨向统计委员会提交附件中所载由统计委员会主席之友编写的题为“对针对《1999 人类发展报告》作出的统计批评的评估”的报告。该报告是应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要求¹提交委员会主席团的。主席团决定将报告递送委员会审查。

讨论要点

2. 委员会或可考虑表示赞同该报告。

注

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0年，补编第4号》(E/2000/24)，第42段。

* E/CN.3/2001/1。

附件

对针对《1999 人类发展报告》作出的统计批评的评估

统计委员会主席之友的报告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背景	1-7	3
二. 导言	8-15	4
三. 国际比较的基础	16-30	5
四. 审议卡斯尔斯的批评	31-48	11
五. 总结论	49-63	25
六. 建议	64-72	28
附录		
一. 卡斯尔斯先生的会议室文件		30
二. 人类发展报告处对卡斯尔斯先生会议室文件的回应		39

一. 背景

1.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了伊恩·卡斯尔斯（澳大利亚）提出的一份会议室文件，其中对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主持出版的《1999 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内容作出了若干批评。委员会确认了《人类发展报告》的重要性及对公众和政府对人类发展问题的认识的影响，同时也确认这些批评具有足够份量，委员会应审议这些批评是否正确。

2. 因此，委员会批准设立一个小组，称为统计委员会主席之友，就这些问题向委员会主席提出咨询意见。该小组的确切职权范围如下：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无法直接核对澳大利亚的伊恩·卡斯尔斯得出的调查结果，在此情况下注意到他就《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报告。委员会对确保《人类发展报告》以正确的统计证据为基础表示非常关心。因此，委员会请其主席任命一个小型的统计专家小组，以便同开发计划署一道编写一份报告，说明《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并集中讨论卡斯尔斯先生所撰写的会议室文件中提出的问题。该小组最迟应在 2000 年 6 月之前向主席团提出报告。

“委员会授权主席团采取任何据其认为是必要的后续措施。”

3. 小组成员：

Ian Macredie（加拿大），主席

Lamine Diop（塞内加尔，代表 Afristat）

Tim Holt（联合王国）

Beat Hulliger（瑞士，代表国际统计研究所）

Ko Oudhof（荷兰）

N. S. Sastry（印度）

4. 小组审议了卡斯尔斯先生撰写的会议室文件（附录一）以及有关的背景文件，还审议了人类发展报告处提供的书面回应（附录二）。小组又作了进一步讨论，并审议了所有有关各方提供的其他书面材料，包括对小组的报告草稿的反馈。

5. 小组表示赞赏这些极其有用的补充材料，不过，小组自己对这一报告的最后内容负责。

6.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全面评估《1999 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依据的所有方面。我们的职权范围是专门针对卡斯尔斯先生对《1999 人类发展报告》所作的批评。

我们集中注意他的各种说法的统计内容和所涉的问题。我们决定较为广义地诠释“准确性”一词。我们从衡量数据质量的概念入手，“准确性”定义为“对目的适合性”。换句话说，《人类发展报告》选用的数据是否符合应用的目的？有没有给出其他选择？数据的局限性有没有受到适当考虑？有没有向《人类发展报告》的读者讲清楚？各成员国的统计数据是否具有足够可比性来支持所得的结论，或将其汇集成为若干国家、若干区域或全世界的合计数字？

7. 此外，虽然我们的职权范围限于《1999 人类发展报告》。并就此提出建议，但我们力求使这些建议有助于编制日后的报告。

二. 引言

8. 促进全世界人类发展是联合国的基本议题之一。谋求确保所有各国人民享有足够好的并且日益改善的生活水平，共同分享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展的成果，同时更充分发挥世界人口的人类潜力，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监测人类发展情况和提供统计衡量资料以支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为此，1990 年以来每年出版《人类发展报告》，促使全世界注意人类发展的进展情况和仍然存在的平等现象。这些报告获得广泛的确认，并且由于它们极受注意，很可能成为促进行动的动力。

9. 每一份《人类发展报告》都载有广泛类别的关于人类发展的不同方面的统计衡量资料，而且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在批评提出的时候，《1999 人类发展报告》是这一系列中最新、最全面的一份。在我们进行审查期间，《2000 人类发展报告》已经出版，不过我们没有将《2000 人类发展报告》列为我们工作的资料来源。从 1990 年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以来，每一份都提出关于人类发展的统计资料，但各有不同的主题，以便突出人类发展的不同方面，引起人们注意。

10. 我们不是要质疑这些报告的性质和重点，这是应该由人类发展报告处及其顾问们来判断的事情。我们的重点，是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分析《1999 人类发展报告》如何使用统计数字。我们认为，衡量人类发展情况的问题十分重要，必须以最严谨的统计做法来支持，否则就有负于全世界人民。人类发展政策应当基于尽量好的证据，这些证据要严格地收集，诚实地运用，让世界各国的决策者知悉情况。

11. 我们知道，《人类发展报告》十分依赖成员国向其他国际机构提供的数据，而这些机构又将数据提供给人类发展报告处。因此，基础数据的质量取决于这些机构的质量保证工作程序。不过，在《人类发展报告》内用这些数据编成指数和支持《人类发展报告》的内容这方面的质量保证，则属于人类发展报告处的直接责任。我们的一些建议的目的在于加强人类发展报告处在这方面的能力，而我们

也知道这将涉及资源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加强是必要的，但如果知道其他机构可以提供的数据的质量，也会有帮助。知道数据的质量，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工作人员就懂得如何将它们用于《人类发展报告》中，从而更充分地加以利用。为此，人类发展报告处工作人员和这些机构要加强并且更经常地互相联系。**我们建议（见第 69 段，建议 6）人类发展报告处工作人员致力建立这种联系。**

12. 我们认为，在参与编制关于人类发展或密切相关问题的报告的各个国际机构之间，用来监测人类发展情况的基本数据应当尽量保持一致。例如，我们注意到，不同的国际机构有不同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这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责任问题，但如果涉及的国际机构有更好的协调，显然会有好处。虽然对这一问题作出建议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但我们希望行政协调委员会注意到这一点。

13. 人类发展报告处制订的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基本人类能力方面的平均人类成就的主要指标。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长而健康的寿命（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量度）、知识（以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总入学率量度）和舒当的生活水准（以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量度）。人类发展指数集中在人的成果，用来评估人的生活，是比人均收入具有更广泛基础的一种尺度。人类发展指数的详细组成见《1999 人类发展报告》（第 159 和 160 页——英文本，下同）。

14. 此外，人类发展报告处制订了几种补充指数，包括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和两种人类贫穷指数（HPI-1 和 HPI-2）。每一种指数的详细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方法的改进而演变和发展。《1999 人类发展报告》对此也有详细描述（第 160-163 页）。

15. 我们不质疑人类发展指数及各种有关指数的基本结构和目的。凡是试图将一个复杂问题综合为一个单一的统计衡量数字或指数，都可能会将问题过分简化或失去对问题的了解深度。Amartya Sen 向《1999 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文稿也提出相同的论点。卡斯尔斯先生在会议室文件（附录一）内所作的批评是在《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指数和各项有关指数的框架内作出的。我们也将在这一框架内作出评论。

三. 国际比较的基础

16. 在卡斯尔斯先生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批评的中心，是如何对每个国家编制的经济统计进行国际比较的基本问题。换言之，我们如何将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经济产出或生活水平换成相同的计量单位？这些国家各自以它们本国的货币来作这些估量。

17. 这是个对国际比较有深远影响的重要问题。例如,《1999 人类发展报告》宣称,到 1990 年代后期,在收入最高的国家生活的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占有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86%。卡斯尔斯先生认为这个数字应为 60%至 65%。同样,《1999 人类发展报告》宣称,拥有世界最富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与拥有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1960 年为 30 比 1,1970 年增加到 60 比 1,而 1995 年再增加到 74 比 1。卡斯尔斯先生认为这些数字应为 1960 年约 12 比 1,1990 年约 18 比 1,1997 年约 16 比 1。根据他的看法,不仅这些比例小得多,并且《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数字所呈现的明显上升趋势,在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表示的估量中是看不出来的。

18. 这是人类发展报告处和卡斯尔斯先生之间的差别很重要的一方面,因此我们在本节先讨论它,然后才在以后各节考虑他的每项具体批评。

19. 争论点是从本国货币转换为一个共同单位(譬如美元),到底是应采用不同货币的比较汇率值,还是应根据该货币的购买力等值。

20. 任何货币的汇率转换值是国际金融市场决定的,它们反映的是在那些机构内的市场力量。实际上在现代世界,汇率受国际贸易以及世界市场上的货物和劳务交换的影响不大。第二种办法是用购买力平价,在国际上可比较的基础上反映国内价格。任何国家的国民收入或经济产出的价值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在这种办法下,购买力平价提供的是当地货币在该国国内能买到什么的国际估值;(见联合国,《国际比较方案手册》及其中所载的参考资料,1992 年,纽约)。

21. 购买力平价表示各种货币间的关系。结果,任何一种知道购买力平价的货币,就能转换成任何另一种知道购买力平价的货币。为了进行多国间的比较,必须选择一种所有其他货币都能转换成的共同单位。在本报告从头到尾,我们将采用美元作为所有国别估量的共同单位。这是一个任意的选择,用任何其他货币也是可以的。这个选择并不影响基本的问题,也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和建议。

22. 明显地,从上文第 17 段中提出的不同数字可见,用汇率还是用购买力平价将国别估量转换成一个共同单位,之间的差别绝非微不足道。此外,这种差别反映在所有各种发达/发展中国家之中。从附图可见这种情形,图中所示为每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与美元汇率换算因数之比相对于该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情况。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占了图左方最低的 20 个位置。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与美元汇率换算因数之比相当接近 1。然而,较不发达国家的这个比率则大于 1,有不少更是远远大于 1。图中越往右边的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越低,最不发达国家在最右边。图中向上倾斜的趋势显示,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越低,则购

购买力平价/汇率之比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买力平价与美元汇率转换因数之比越大。最不发达国家的比率可高达 4 或以上。因此，如果以美国和一个欧洲大国为例来比较其人均收入、经济产出或生活水平，因为比率接近 1，所以不管用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来换算都大同小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比率还是会随着时间，跟着汇率变化而波动。然而，拿美国或任何一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一个最不发达国家进行类似的比较，结果就会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例如人均收入的转换，用购买力平价换算会比用汇率换算大 4 倍或更多。因而，换算因数的选择对不同的发达/发展中国家有重大影响，近年来这种关系更为突出，因为与其他货币比较，美元汇率又有所加强。

23. 人类发展报告处对卡斯尔斯的批评所作的回应（附录二）承认，与卡斯尔斯先生和一般的发展经济学家意见相同，对于比较生活水平，采用人均购买力平价较佳。实际上，自 1990 年以来，人类发展指数本身的人均国内总产值部分就使用这一做法来反映生活水平。此外，购买力平价转换也用于性别发展指数、人类贫穷指数及其他估量，例如《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妇女权力指数。因此，《人类发展报告》里的关键统计指标都采用购买力平价转换。但是，在上面第 17 段引述的《人类发展报告》正文内关于世界收入份额的提要比较中，则采用了美元汇率转换。

24. 然而，人类发展报告处支持在正文中用汇率转换有两个基本理由。第一，尽管一般喜欢用购买力平价转换来比较生活水平，但人类发展报告处认为这最终是经济判断而不是统计客观性的问题。第二，人类发展报告处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边际化，它认为为此目的，像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主题是最穷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边际化的时候，采用美元汇率往往更适当。

25. 我们认为，对于实际的经济（而非纯粹金融的）现象，诸如生活水平的比较（以人均国内总产值反映），以及引伸为经济产出（国内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国内总产值或人均国内总产值）的比较，采用购买力平价转换而不是美元汇率转换，存在着有力的理由。我们相信，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接受这种做法。卡斯尔斯先生提供的对日本和中国的一系列比较就是一个例子，其中提出了这两国对各种项目的人均消费比例，连同这两国根据购买力平价转换和汇率转换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比例。我们对一些同地区国家的双边比较也做了这种分析（见附表）。虽然结果一般不像卡斯尔斯先生所选择的日本/中国的比较那样突出，但基本情况是明显的。对于食品消费之类项目，其价格无弹性，双边比较相对接近 1，人均国内总产值较高的国家有稍微高的消费。对于拥有电视机或个人电脑之类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而且价格有弹性得多的项目，比例就大很多。大体上，任何两个国家用购买力平价来比较都显现这种情况，即比例比食品消费的大，但比技术型项目的小。这是可预料到的。然而，用汇率来比较一般大很多，往往甚至超出个人电脑和电视机等项目的消费比率范围。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似乎同其他衡量比较一致，而且对进行比较的目的更有意义。

附表

国际比较：货物和劳务的人均产量或用量比例

比较	每日人均卡路里供应量, 1996	每日人均脂肪总供应量, 1996 (a) (克)	每日人均蛋白质总供应量, 1996 (a) (克)	国内总产值指数	电视机每千人, 1996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1996 (吨)	人均商业能源用量 (石油当量), 1996 (千克)	人均电力消耗量, 1996	电话干线每千人, 1996	国际旅游出发次数每千人, 1996	人均个人电脑	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 1997 (购买力平价美元)	人均国内总产值, 1997 (美元)
日本/中国	1.0	1.3	1.3	1.6	2.8	3.3	4.5	9.1	10.9	32.6	42.7	7.7	45.9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6	1.6	16.3	11.7	18.8	24.4	111.0	45.2	8.2	26.8
大韩民国/越南	1.3	2.3	1.5	1.7	1.8	0.8	8.0	23.1	26.9		39.9	8.3	29.8
墨西哥/尼加拉瓜	1.3	1.8	1.6	1.5	1.1	5.3	2.9	3.9	3.7	1.6		4.2	10.0
南非/莫桑比克	1.6	2.4	2.1	2.2	41.0	69.0	5.2	58.9	33.3		47.1	10.0	21.9
南非/中非共和国	1.5	1.2	1.6	1.7	24.6	69.0		125.4	33.3	0.8		5.5	11.3
巴西/厄瓜多尔	1.1	0.8	1.3	1.1	2.0	0.8	1.4	2.6	1.3		4.7	1.3	3.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地	1.5	2.4	1.5	1.7	63.6	86.0	22.9	40.2	21.0	11.5		5.4	12.6
塞舌尔/斯里兰卡	1.1	1.5	1.5	1.4	2.3	5.8		7.2	14.0	98.0		3.3	6.1
塞舌尔/印度	1.0	1.6	1.3	1.6	3.0	2.1		3.0	13.1		10.3	4.9	12.7
科威特/约旦	1.1	1.2	1.4	1.6		10.1	7.9	14.2	3.9		3.4	7.3	15.6
黎巴嫩/约旦	1.2	1.4	1.2	1.2		1.8	1.1	1.7	2.5	19.0		1.7	4.2
埃及/埃塞俄比亚	1.8	2.6	1.5	2.1	31.5		2.2	36.4	16.7	41.9		6.0	10.6
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	1.5	2.6	1.7	2.1		15.0		25.3	54.0			10.0	16.7

26. 人类发展报告处同意购买力平价转换较适合用来作生活水平比较, 并将它们用于各种关键指标。然而, 在各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不光是 1999 年) 中, 不管该年的主题为何, 正文和关于世界收入份额的提要比较中却都用美元汇率比较来表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正文和提要比较之中不是更经常地采用购买力平价比较, 如果它们确实被认为是比较生活水平的更好换算因数。

27. 然而，对于人类发展报告处提及的使用购买力平价转换的两个重要缺点，需要作出回应。第一个是基本数据计量工具、数据收集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质量问题。第二个是涵盖世界多少国家的问题。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同意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但我们认为尚未足够成为用美元汇率转换而不用购买力平价转换的理由。购买力平价的质量需要提高是无庸置疑的，最近一些报告已探讨这个问题（参看经合组织，“对经合组织-欧统处购买力平价方案的审查”，1997年；“对国际比较项目的评价”，统计委员会文件，1998年；“世界银行对国际比较方案评价报告的评论”，统计委员会文件，1999年）。世界银行老早就鼓吹采用购买力平价衡量，并且已做很多工作来提高质量。统计委员会已审议这个问题，并且支持各种加强国际比较方案的提议。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我们支持关于加强这个方案的呼吁。然而，如果购买力平价转换是比较好的，那么就不能以质量问题为理由而从购买力平价估计转为用美元汇率，因为后者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可能小三倍多。考虑到这两种计量存在这么大的差别，使用错的计量（只是因为它较为准确）并不符合“适合用途”的标准。还有，我们注意到，人类发展报告处对《1999 人类发展报告》各表所列的 174 个国家使用购买力平价转换来计算人类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人类贫穷指数和有关的指数（我们知道，这些指数有的是世界银行用计量经济模型而不是从直接收集的数据推算出来的。如果质量是最重要的考虑，这与《人类发展报告》的关键指标使用购买力平价转换就难以调和。这种使用与涵盖问题也有关系：提到的 174 个国家占了世界上将近 5.75 亿的人口。只提供了基本指标的另外 13 个国家估计大约有 7 000 万人口。

28. 人类发展报告处认为，如果强调的是较不发达国家的边际化，则美元汇率转换往往较适当。我们不知道边际化在经济上明确的定义，但是从《人类发展报告》的正文看，它指的是世界贸易准入、技术采用、国际（多边）关系与合作等。这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适当反映这些方面的统计计量将很有用。然而，一个国家大部分产出流进国内消费，而非流进世界贸易，因此很难找出理由以汇率为基础转换一个国家的整个国内总产值。我们不知道关于汇率转换的这种论点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日益获得普遍接受。

29. 尽管如此，在有些应用中是适合采用汇率的，诸如用来表述一国的国际债务相对于国内总产值的情况。汇率也适用于国际金融交易，特别是在各国从国际市场获得货物和劳务时，因为汇率决定必须支付的价格和进口货的成本。这将反映在这些货物在该国的价格，因此也反映在购买力平价比较之中，与涉及的国内支出成比例。因此，至少原则上，汇率的影响应适当地反映在购买力平价换算因数之中。然而，我们也认识到汇率可能被认为是一国从工业化国家获得高技术货品和专门性劳务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发展与此有关的统计计量办法会有帮助。但是，如 1999 年和更早的《人类发展报告》那样用美元转换而不是购买力平价转换来计算人均国内总产值和估计国民收入，似乎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

30. 总之，我们认为，使用换算因数的系统性不一致即对《人类发展报告》关键指标使用购买力平价，而在正文和关于世界收入份额的提要比较中却使用美元汇率，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人们广泛同意使用购买力平价转换是比较生活水平的最佳基础，因此我们建议，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全部使用它作为主要的比较方式，因为这种转换已经包含在各项关键指数之中（见第 64 段，建议 1）。确定边际化的定义，并拟定适当的统计指标以补充而非取代人均国内总产值的购买力平价转换，也会有好处；我们也建议这样做（见第 65 段，建议 2）。

四. 审议卡斯尔斯的批评

31. 在以下各段我们将逐项评估卡斯尔斯先生的批评。他的原文以黑体字抄录。

32. 1) 富国占世界产出的比例

“到 1990 年代后期，在收入最高的国家生活的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有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86%……”（第 3 页和第 2 页的图）。

- 1990 年代后期的正确数字是 60%-65%。1996 年贸发会议秘书处用人类发展报告处自己提供的数据估计，如果各国按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的高低排列，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这一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比例 1960 年为 64.4%，1991 年为 63.7%（《最不发达国家：1996 年报告》，第 v 页）
- 早期的《人类发展报告》突出地宣称，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70% 增加到 1980 年代后期的 80% 以上。不过，称这种比例现已达到 86% 的说法经不起推敲：由此推断世界人口的其余 80% 仅生产全球产出的 14%。
- 事实上，一个比这小一点的人口，即按世界银行的定义生活在“低收入”和“下中收入”国家的占全世界 75% 的人口，在 1995 年生产了全世界 63% 的谷物和 81% 的块根和块茎作物，1997 年占商业能源产出的 44%（和消费的 38%）（世界银行，1995 年和 1997 年《世界发展指标》）。
- 据安格斯·麦迪逊的估计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资料，6 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土耳其）1997 年就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25% 以上。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更不用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余大部分国家）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

2) 穷国占世界产出的比例

“到 1990 年代后期……，[世界人口中]最底下的五分之一仅生产世界产出的 1%”（第 3 页和第 2 页的图）。

- 考虑到国家间一般价格水平的差别，最底下五分之一人口生产的产出现在占 4% 左右。据上述贸发会议的估计，1991 年为 3.6%。
- 在 1999 年发报告中，占世界人口约 10% 的“最不发达国家”（表 16，第 200 页）1997 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 15.7%（表 1，第 137 页）。
- 这意味着，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 20%”，即使其中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同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一样贫穷，他们生产的世界国内总产值肯定点 3% 以上。

32.1 虽然卡斯尔斯先生在会议室文件中并未明确指出，但他的主要批评是选用美元汇率，而不是以购买力平价为转换因数。各点补充旨在加强这个论点。人类发展报告处（见附录二）对这些批评作了大量回应，但也认识到根本的问题所在。

32.2 总的说来，基于上一节所述的理由，我们主张在各种指数（现行做法）以及每个《人类发展报告》的正文、附图和附表中都使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转换。这应是由于比较经济产出、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方法，并应是评估全球人类发展的基石。不过，表明边际化的补充指数如果能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加以定义和拟定出来，是会有助益的。

33. 3) 富国和穷国间的差距

“当今全球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均现象已到了荒诞的地步。拥有世界最富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与拥有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国内总产值）的差距，1960 年为 30 比 1，1990 年增加到 60 比 1，而 1995 年再增加到 74 比 1”（第 104 至 105 页）。

- 这些说法第一次出现《1992 人类发展报告》中，并已在前面所引述的贸发会议的报告中受到批驳。
- 在随后几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国内总产值的估计数表明，按国家平均值排列，最高五分之一和最低五分之一之间的比例，1960 年为 12 比 1，1990 年为 18 比 1，1997 年为 16 比 1。
- 所有专家都同意，不计价格水平差别的估计数，不能用来正确地比较“生活水平”或“人类发展”。
- 不论怎么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数字是前后不一致的。1999 报告的“概论”中说 74 比 1 的比例是 1997 年的（第 3 页），而在同份报告的正文部分却说是 1995 年的（第 105 页）；但是在《1998 人类发展报告》中，1995 年的比例为 82 比 1。

33.1 这里的根本问题仍是用购买力平价转换的问题。认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报告是对《人类发展报告》的批驳没有理由的，不过前者使用购买力平价转换，这与卡斯尔斯先生的主要论点是一致的。上面第 33 段第二点中的数字是基于购买力平价转换。人类发展报告处同意用购买力平价转换来比较生活水平较好（第三点）。最后一点涉及一个非实质性的打字错误，不过这是在文稿制作方面质量控制不足的例子。建议 7（见下文第 70 段）处理了这个问题。

33.2 此外，一些读者有可能对差距一词弄不清，把它解释为两个数值的绝对差别，而在《人类发展报告》是正确地指两上数值的比率。由于基值不同，有可能一国的相对增长率比另一国的快，但从绝对值来看，差距仍在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用购买力平价来估计人均国内总产值，《人类发展报告》说差距在扩大也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认为这明显不是原来的意思。**我们建议，在今后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要避免把文字写得在这一点上引起任何的可能混淆（见第 71 段，建议 8）。**

33.3 虽然卡斯尔斯先生没有指出，但我们注意到，正文和附表（表 6）应该但并非涵盖相同的期间。

34. 4)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

“最不发达国家继续边缘化，并在亚洲危机影响下加快了边缘化速度”（第 105 页）。

- 最不发达国家近几年的人类发展速度相关很大。
- 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9 月》中发表的估计数显示，作为一个整体，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从绝对值看非常低）比“七国集团”（G7）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得快。2000 年，即连续第六年，也将是如此。考虑到据联合国估计最不发达国家总人口每年 2.5% 的增长，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数意味着，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 1995 年增长 3.7%（G7 为 1.6%）、1996 年 3.1%（G7 为 2.3%）、1997 年 2.5%（G7 为 2.3%）、1998 年 2.0%（G7 为 1.7%）、1999 年 2.7%（G7 为 2.0%）、2000 年则为 2.8%（G7 为 1.9%）。
- 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1985 至 1996 年之间，最不发达国家总入学率在初等教育一级增加 48%，在中等教育一级增加 55%，和在高等教育一级增加 70%（1998 年《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第 2 至 12 页）。

34.1 这里有几点问题，与选择用美元还是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转换有关，但不止于此。

34.2 首先，关于亚洲危机的影响内容性质上与报告正文的大部分颇不相同。具体地说，其中的论断是根据在危机爆发后尚未得到反映实际影响的通常一系列经

济统计数据之前过早对亚洲危机影响作出的预测。这些数据后来才能得到。人类发展报告处承认，这部分内容放在第一章比较适宜，在那里，使用的是预测会比较明显。考虑到《人类发展报告》的性质，我们认知到人类发展报告处虽然还没有更实在的统计数据，仍希望对最近发生的世界大事的情况作出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在文中说明这样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质量也较差（见第 66 段，建议 3）（下文第 37 段详述了我们对使用预测的意见）。**

34.3 第二个问题是“边际化”是否在扩大。最不发达国家近年来的人类发展速度明显地相差很大。不过，平均来说，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是最不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高，这已考虑到前者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就人类发展指数中的人均国内总产值部分来说，这应导致最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缩小。当然，如与这两类国家的绝对差距比较，缩小幅度可能很小，强调指出这一点也是合理的。即使超过 10 年的轻微相对增长，恐怕也未能把差距缩小到决策者所期望的程度。但是，从经济上说，任何差距应该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不过，这由于使用美元汇率为转换因数而更形混淆。如果美元同最不发达国家的货币相比的升值率快过最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增长率，相对增长带来的差距缩小就会被汇率的恶化抵消有余。这样，即使最不发达国家有较快的实际增长，但总的来看差距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用美元汇率计算）。如果改用购买力平价转换因数（事实上用任何指数进行转换也一样），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相同的现象，不过这些指数比汇率较稳定，本质上变化速度缓慢得多。

34.4 关于上面第 34 段中的第一点，如果卡斯尔斯先生的意思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合计数据掩盖了这些国家参差不齐的经验，因此可能引起读者的误解，那我们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

34.5 卡斯尔斯先生有关入学率（应该按适当年龄组的人口增长（如果有此数据的话加以调整才对）的论点相信是为了证明，最不发达国家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教育部分的差距也正在缩小。

34.6 考虑到过去 20 至 30 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显著延长，可以说，人类发展指数的寿命部分也是如此，不过目前在受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影响最大的国家，艾滋病的影响正在批转这些进展。

34.7 因此，就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组成部分（人均国内总产值、入学率和寿命）来说，最不发达国家近年来在人类发展方面至少是有所改善的。

35. 5) 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按 1987 年美元计算）平均从 1990 年的 277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的 245 美元（表 6，第 154 页）。

- 这些数字同世界银行的估计数或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不一致，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都显示，从 1990 到 1997 年，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了 10% 以上。
- 《1990 人类发展报告》显示 1990 年代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减少，原因是人类发展报告处没有进行同类比较。他们计算的 1997 年平均数没有列入 1990 年平均数中计入的一个主要发达国家（苏丹）。由于 1997 年苏丹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是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数的 3 倍多（世界银行，《1999 年世界发展指标》，表 4.1），1997 年把该国排除在外造成了错误的比较。
- 1990 和 1997 年的国内总产值估计数都列在《1999 年人类发展报告》表 6 的 30 个最不发达国家，如果用《人类发展报告》本身的数据，它们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227 美元起在 1997 年有了增加。这些国家加上苏丹（用《人类发展报告》关于该国人均国内总产值的估计数和世界银行的估计增长）的平均数从 1990 年 270 美元增加到 1997 年 297 美元（这同《世界经济展望》的估计数所显示的 10% 增长相一致）。

35.1 卡斯尔斯先生说的是表 6 底下按国家类别开列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数字。问题是每年这些美元数所涉的都是不同的国家组合。人类发展报告处说，正文中并未使用这些平均数来作为推断。但我们认为，如果有统计资料的话，正文中的结论必须确实是根据这些统计资料作出。如果另有统计资料来源用来支持文中的结论，应当正式说明。而如果统计内的是最好的资料，正文就不应与此发生矛盾。如果时间系列或增长率是主要关心的问题，那么，提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组合的估计数，就会引起读者严重的误解。我们认为，人类发展报告处应当在一致的基础上提供估计数，并且这些估计数应当影响到《人类发展报告》的正文。

35.2 我们建议，作为一般做法，人类发展报告处对任何时间系列都提供可比较的数字，以免读者从前后不一致的统计数字作出错误的推断（见第 67 段，建议 4）。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在某个时候，当一个很大的国家，例如中国，不再属于世界或某个区域的低收入国家分类时，增长率就很可能发生可观的、但不真实的变化。如果不采用适当的统计程序，而继续按现行做法提出资料，时间系列就会出现严重间断，可能引起读者严重的误解。

35.3 作为统计人员，我们认识到，为了达到这种报告的目的，不仅要有前后一致的出版战略，而且要认真、全面地应用统计技能，制作适当的估计数来弥补缺少的数据。人类发展报告处的数据库现在已用光盘提供（对此我们热烈欢迎），当个别使用者取得系列数据，进行分析时，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36. 6) “南亚”的产出增长率

“南亚”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1990 年 463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 432 美元（表 6，第 154 页）。

- 这个比较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表 6 中列有 1990 年和 1997 年可比数字的所有“南亚”国家（即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在这期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都增加了。没有提供 1997 年数字的唯一主要国家（伊朗）在这期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也增加了（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5 月》，第 153 页）。6 个正数的平均数不可能是负数。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出现错误的原因还是没有进行同类比较：1990 年的平均数中包括伊朗，而 1997 年的平均数中却不包括伊朗。由于伊朗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特别是根据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采用的 1987 年汇率换算办法），1997 年把伊朗排除在外降低了该年的平均数，从而使比较失去意义。

7) “南亚（不包括印度）”的产出增长率

“南亚（不包括印度）”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1990 年的 709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的 327 美元（表 6，第 154 页）。

- 在表 6 列出可比数字的 130 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在 1990 至 1997 年期间减少一半。因此，在一组总人口近 4 亿的国家中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减少。
- 实际上，表 6 所示的 1990 至 1997 年南亚除印度外的其他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变动如下：孟加拉国+22%；马尔代夫 14%；尼泊尔 18%；巴基斯坦+15%；斯里兰卡+26%。
- 出现错误的原因又是没有进行同类比较：伊朗列入了 1990 年的平均数，但没有列入 1997 年的平均数。

36.1 适用于第 35 段的评论也同样适用于这一段。

37. 8) 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安哥拉和科威特……[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可能降低 14%至 18%……。赞比亚……[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预计可能降低 9%”（第 40 页）。

- 1999 年 7 月一份出版物发表的这些估计数也见于题为“亚洲危机对遥远的经济体和人民造成伤害”的表 1.3 中（第 41 页）。
- 事实上，根据 1999 年 4 月 20 日发表的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5 月》的资料，这些下降并没有发生。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安哥拉和委内瑞拉 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分别下降 18%和 6%，而 1999 年 4 月公布的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数根本没有任何下降。《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加蓬、尼日利亚、蒙古和智利 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分别下降 13%、4%、6%和 3%，而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

所有这些国家的国内总产值都增长了 2%至 4%。《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科威特和赞比亚分别下降 14%和 9%，而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是仅下降 2%。

37.1 这里的问题是预测作出的时间及其使用。《人类发展报告》是一份大文件，必须译成 11 种语文出版发行。这意味着往往不可能象人类发展报告处肯定希望的那样，采用与出版日期最接近的数据。因此，使用预测是一定的。事实上，从文件定稿之日到出版相隔很久，因此出版前还会发布更新的、可能是矛盾的数据。对《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的数据够不够新提出批评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日期。

37.2 人类发展报告处在其回应中说，《1999 人类发展报告》明确指出这些是预测。这没有错，但指出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即数据是预测的。不能指望经验不足的《人类发展报告》读者理解预测的巨大误差幅度，特别是对宏观经济措施而言。我们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发展报告》应向读者清楚说明预测的推测性质，在“《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说明”中加以详细说明，并在正文内的适当地方提及这些材料（见第 66 段，建议 3）。

37.3 在这一例子中，事后证明预测错误的严重程度，可能使人类发展报告处在将来编写《人类发展报告》时对使用类似的预测会三思而后行。

37.4 在向读者说明不确定性程度这个问题上，我们附带指出，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变动幅度很大，原因之一是改变方法或者采用经修订的数据（例如见《1999 人类发展报告》第 166 页）。应该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

38. 9) 1990 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 1990 至 1997 年期间，[整个世界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以上”（第 22 页）。

- 这是大为低估的数字。1990 至 1997 年期间，整个世界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2.2%（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10 月》，第 158 页）和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数。
- （按照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占世界人口 77.5%的“发展中国家”，1990 至 1997 年期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4.3%（货币基金组织，同上，第 158 页）；与此相比，在先前 170 年中，这些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在 1%左右（安格斯·麦迪森，“经济进展：从历史角度回顾上半个世纪”，载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类发展的事实和假象》，不定期论文系列 1/2000）。

38.1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列出了它所获得的互相矛盾的数据的来源文件，并将用来佐证“1%以上”的数据称为“不确定的统计数据”。1990 至 1997 年期间

的世界经济到底增长多少，人们的看法仍然十分分歧，因此，“平均每年增长 1% 以上”这一说法可能不像卡斯尔斯先生所声称的是“大为低估的数字”。

38.2 然而，根据“适合使用”原则，没什么理由在“人类发展对照表”（《人类发展报告》，第 22 页）这样的总结表中使用这种有效性令人怀疑的估计数。像对照表这样的简化总结表所载的数据必须具有足够可靠性，使读者能够正确理解其中所列内容。既然采用了不确定的统计数据，本来可以用这样一条注释来加以说明，即：“1990 至 1997 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有不同的估计约在 x% 至 y% 之间。”

38.3 《人类发展报告》这一部分的下一条说：“同期内，实际人均消费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2.4%”。在会议室文件提出后的一份信函中，卡斯尔斯先生提请注意这两个说法的明显不一致（即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 1%，而实际人均消费增长 2.4%）。人类发展报告处表示，他对不一致之处所作的解释是不对的。人类发展报告处的答复函中说，“该数据是指私人消费，而不是人均私人消费。换言之，根据人类发展报告处的解释，这看来是编辑时犯的一个简单错误。这个例子，和本报告其他地方举出的类似例子，促使我们建议审查编制《人类发展报告》的质量保证程序（见第 70 段，建议 7）。讲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还要指出，我们并不相信该数据确实是指“私人消费”。这看来也是因为在审查文稿时没有应用所需的专门知识。我们建议将来编制《人类发展报告》时，要应用必要的专门知识，必要时借助人发展报告处之外的专门知识（见第 68 段，建议 5）。

39. 10)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独联体的增长

“自 1980 年以来，有 60 个国家日渐变得越来越穷”（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的前言，第 v 页）。

- 署长似乎误解了报告正文中关于“59 个国家——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独联体的国家——人均国产总值下降”（第 31 页）的说法。
- 这一说法指的是 1980 至 1996 年整个期间的净变化率，它不能用来推断所有这些国家在这期间“日渐变得越来越穷”。恰恰相反，在 1980 至 1997 年期间，这些国家中有许多的人均国产总值都经历了 5 年或 7 年的增长（表 6），并且在 1995 至 1998 年期间，其中大部分国家的人均国产总值都在增长（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10 月》，第 169 至 179 页）。
- 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27 个“转型期国家”中有 21 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44 个国家中有 35 个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在 1995 至 1998 年期间都在增长（第 176 页和第 179 页）。

39.1 人类发展报告处回应说，“日渐”这个词显然是用错了。我们的建议（见第 70 段，建议 7）对此也适用。

40. 11) 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

“在受艾滋病毒感染人口占 10% 或以上的 9 个非洲国家，即博茨瓦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人口预期寿命预计到 2010 年会缩短 17 年，下降到 49 岁……”（第 42 页）

- 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艾滋病流行前达到 66 岁（49 岁加 17 岁）。
-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世界人口前景：1989 年订正本》），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 61 岁，大多数国家的最高平均预期寿命都大大低于 61 岁。
- 这并不是否认艾滋病流行的极端严重性和联合国预测人口预期寿命缩短的重大意义。

40.1 卡萨斯先生所引的《人类发展报告》这一段也许表达得不够清楚。但我们也注意到，他得出的推论与他引用的人口司文件也不相符。为了澄清这一点，下面第 40.2 段抄录了人口司《世界人口估计和前景 1998 年订正本》的有关一段。

40.2 “《1998 年订正本》表明，艾滋病在死亡率和人口减少方面造成了巨大灾难。在 29 个研究过艾滋病影响的非洲国家中，1995 至 2000 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预计将减少到 47 岁，而如果没有艾滋病流行的话，出生时预期寿命本来预计可达到 54 岁。这是缩短了 7 年。如果重点研究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即感染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艾滋病毒）的成年人口占 10% 或以上的 9 个国家（博茨瓦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就会发现艾滋病对人口的影响更加惊人。在这些国家中，1995 至 2000 年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估计比没有艾滋病情况下本来的预期寿命减少 10 年。到 2010 至 2015 年，9 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预计比没有艾滋病情况下的减少 17 年。”

40.3 如果《人类发展报告》逐字引用人口司的报告，也许会更好。

41. 12) 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妇女人数

“预期近 3.4 亿妇女活不到 40 岁”（第 22 页）。

- 联合国人口司估计，在 2000 年中期全世界 30.2 亿妇女中，有 22.8 亿年龄在 40 岁以下（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订正本》，第 11 页）。
- 在这 22.8 亿妇女中，预计 22 亿以上（占总数 96.5%）能活到 40 岁（计算方法是把预测 2040 年为 40-44 岁、2035 年为 35-39 岁、2030 年为 30-34 岁及以此类推的妇女人数相加）。因此，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预期不能活到 40 岁的妇女人数不足 0.8 亿，而不是 3.4 亿。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文内的错误很可能归咎于表 4 有一栏的标题不正确（“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这导致编者把“全世界”活不到 40 岁的人口比例（12.5%）当作是整个妇女人口的比例。
- 事实上，全世界 5 岁以下男儿童死亡率都是 8.3%（世界卫生组织，《1999 世界卫生报告》第 90 页）。因此，人发报告所给的不能从 0 岁活到 40 岁的 12.5% 比例意味着，从 5 岁活到 40 岁的几率非常高。

13) 预期活不到 60 岁的人数

“预期约 15 亿人活不到 60 岁”（第 22 页）。

- 这是栏目标题不正确造成的又一起错误推论（表 5，“预期活不到 60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 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数意味着，现在活着但不能活到 60 岁的人数为 7.5 亿左右，不是 15 亿。

41.1 人类发展报告处承认这些数字是基于对那个变数的错误解释，因而是错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赞同把卡斯尔斯先生那另一种“快速”算法视为正确的做法）。正如我们在本报告其他地方多次说过，我们建议在审查《人类发展报告》时，要更加注意应用专门技术知识（见第 68 段，建议 5）。

42. 14) 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失业率

“[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失业”（第 32 页）。

- 工业国家劳动力中失业青年（20 至 24 岁）的比例为 16%，即六分之一左右（表 26，第 236 页）。
- 表 26 有一条脚注正确地指出“总”失业率同劳动力有关，但没有脚注说所引述的青年失业率也是这样算的。

42.1 对这个统计数字的正确理解是，青年（15 至 24 岁）劳动力每六人中有一人失业，而不是全部青年人口每五人中有一人失业。由于在这年龄组中的劳动力参与率受到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比率影响，并且往往低于 50%，因此不同的理解差别很大。这是错误使读者对所述的现象产生实质性不同印象的一个例子。

42.2 人类发展报告处还指出，这个数字指的是欧洲联盟国家，而不是经合组织国家，这也是一个实质性差别。我们认为，加强质量保证程序会有助于避免这种误解（见第 68 和 70 段，建议 5 和 7）。

43. 15) 南亚国家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

“在许多南亚国家，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 33% 以上……”（第 94 页）。

- 根据《1999 人类发展报告》本身的材料（表 12），1997 年农业占国内总产值达 33% 的南亚国家只有尼泊尔（41%）和不丹（38%）。这两个国家的人口不足南亚人口的 2%。
- 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农业占其国内总产值的 20% 至 25%。

43.1 人类发展报告处承认所述的 33% 数值与《人类发展报告》表 12 中所报的不一致，后者为 25%。拿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与农业占总税收的比率作比较，其错误没有另一些同类错误那么实质性。

43.2 对人类发展报告处随后说的占税收 6% 是否适宜的问题作出评论，就超出我们任务的范围了。

44. 16) 综合总入学比率：教科文组织数据的采用

“今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是根据……教科文组织关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总入学率的订正数据编制的”（第 128 页）。

- 表 TNI 关于总入学率的订正数据（第 164 至 166 页）造成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重大变化，原因是在《1998 人类发展报告》中，约有 50 个国家没有采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
- 除了某些例外（见下文），人类发展报告处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因此，是《人类发展报告》的决定而不是“订正数据”造成了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变动。

44.1 《人类发展报告》必须依靠许多国际机构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难免有局限性，因为把来自很多国家的数据弄得可资比较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且其中许多国家仍在设法建立基本的国家统计制度。此外，需要有从深入的经验得来的专门知识，才能对一批数据作出解释，并将这些数据适当地应用于某一用途。

44.2 虽然不能认为人类发展报告处应对国际机构提供的数据的局限性负责，但它应始终坚持采用在报告定稿时可得的最新数据，除非有极大理由不这样做。而且，它在使用别人的数据时，有责任遵照提供数据的机构的意见。

44.3 采纳人家的意见，也适用于在特定用途上对系列数据的选择。例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所编制的入学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发展报告处过去没有一贯遵照教科文组织的意见。

44.4 不过，我们了解到在选择系列数据、根据这些系列进行计算和对这些系列作出解释方面，人类发展报告处与教科文组织已建立起比以往有效得多的工作关系。如果这种工作关系的目标能够实现，它足以成为人类发展报告处与其他数据提供者建立关系的榜样。

44.5 事实上，我们更一般地建议人类发展报告处设法与关键系列数据的提供者加强合作，因为这样将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具体数据集另外包含的专长和知识（见第 69 段，建议 6）。

45. 17) 总入学比率以 100% 为上限

《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没有采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和联合王国综合总入学比率。对这些国家，所报的比率，即人类发展报告处用来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比率，都是以 100% 为上限（表 1，第 134 页）。

- 为这个比率设上限的决定表明该处不懂这些数字的根据。“总入学比率是不论年龄大小，入学接受某一级教育的学生人数占……正式学龄人数的百分比”（第 254 页，着重线为本文所加）。
- 在许多“高度人类发展国家”，有很多超过正式学龄的人入学就读，因此把其中有些入学比率下调是不合逻辑的。入学比率被定在上限的 4 个国家，其“超过正式学龄”的入学人数都多于没有入学的“正式学龄”人数。
- 如果人类发展报告处没有出这个错误，1999 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而不是加拿大。

45.1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清楚地指出，人类发展指数是以 100% 入学率为目标的。这意味着它假定了超过 100% 的入学率无助于人类发展。如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所述，随着有更多国家的入学率超过 100% 的目标，将来会审查设定上限的做法和它所根据的假设。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中提到，人类发展报告处和教科文组织曾举行会议商讨拟定新的教育指标的问题，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45.2 所需要做的不仅是调整标杆，与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会议更可能导致根本性的改变。如卡斯尔斯先生所指出，入学率超过 100% 的唯一情况是入学的学生之中有许多年龄超过分母中所包括的年龄范围的上限。实际上，这些“大龄学生”的人数必须超过学龄人口中的非学生人数，入学率才会超过 100%。

45.3 人类发展报告处必须决定，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以下两者之间是否有重要的差别：

- (a) 让正常学龄的人能够上学；
- (b) 让学业完成前辍学的人能在长大成人后补回少年时失去的教育。

如有差别，修改后的措施应该反映出来，因此不是用总入学比率，而是用另一种指标。如没有差别，就确实需要重新考虑现行的有上限的做法。

45.4 如前年述，人类发展报告处与关键系列数据的提供者加强合作，就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具体数据集另外包含的专长和知识。我们建议人类发展报告处设法建立这种合作（见第 69 段，建议 6）。

46. 18) 综合总入学比率：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

在性别发展指数表中，和在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时，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芬兰、瑞典和联合王国女性综合总入学比率被定在上限，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男性综合总入学率也被定在上限。

- 这种程序是不对的，原因与上文第 17 点说明的相同。
- 结果，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受到严重歪曲。例如，教科文组织所报的联合王国综合总入学比率女性为 109%，男性为 99%。但是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时，《1999 人类发展报告》所报的联合王国比率，女性为 100%，男性为 99%。
- 尽管联合王国入学的女性对男性比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但是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数值的依据却假定了有 47 个国家的女性对男性入学比率高于联合国，这些国家是：加拿大、挪威、美国、瑞典、冰岛、法国、芬兰、丹麦、新西兰、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以色列、文莱达鲁萨兰国、葡萄牙、巴哈马、斯洛文尼亚、科威特、巴林、阿根廷、乌拉圭、卡塔尔、斯洛伐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匈牙利、委内瑞拉、巴拿马、爱沙尼亚、马来西亚、古巴、白俄罗斯、立陶宛、保加利亚、（西）萨摩亚 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洪都拉斯、纳米比亚、蒙古、尼加拉瓜、博茨瓦纳和莱索托。

46.1 我们对卡斯尔斯先生的第 17 点的评论（见上文第 45 段）也适用于这一段，而且如果男性数据被定在上限而女性没有（或是反过来），则对性别发展指数也有影响。

47. 19) 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的含义

“一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越接近于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它的性别差距就越小。但是每一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都低于它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男女不平等。在 143 个国家中，有 43 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排名低于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这表明在培养妇女的能力方面同男子相比进展不一样”（第 132 页）。

- 人类发展报告处误解了性别发展指数结果。性别发展指数并不表示“在培养妇女的能力方面同男子相比”是否有“进展不均”或是相反的情况。
- 前几份报告曾说，“任何一个社会对待妇女都没有对待男人那么好”（《1997 人类发展报告》，第 39 页），“在每一个国家，妇女的人类发展成就都不如男人”（《1998 人类发展报告》，第 31 页），这些说法都反映了类似的错误概念。
- 从表 2 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男女分列的指数。它们表明，在例如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女性指数高于男

性指数。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妇女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男子，差别远大于人类发展报告处为了“计及妇女一般比男子寿命长这一事实”而采用的 5 年差别（第 160 页）。

47.1 如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所述，卡斯尔斯先生从技术上说是正确的，但人类发展报告处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推断的不均的方向是有充分根据的。

47.2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可能是在我们的任务范围以外，因为这是如何理解性别发展指数的问题，而与用来计算性别发展指数的统计数据无关。不过，它表明性别发展指数不容易理解，可考虑采用较为简单的按性别分列发展指数，例如分开男性和女性来计算和比较人类发展指数。

48. 20) 国内总产值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贸易和增长之间存在强烈联系，但是同人类发展却没有必然联系……。埃及和巴基斯坦……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人均收入增长超过 3%，但是两国在人类发展方面还要走漫长的道路。”

- 拿来与收入增长进行有意义比较的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改善程度，而不是它的绝对水平。
- 事实上，埃及和巴基斯坦 1985 至 1997 年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并没有达到 3% 以上：用《1999 人类发展报告》本身提供的数据（表 6）推算，埃及的年增长率为 1.7%，巴勒斯坦为 2.5%。
- 然而，这两国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有快速的“人类发展”（按人类发展指数衡量）。《1999 人类发展报告》自己也把埃及排在印度尼西亚之后，列为“低度人类发展”国家中在这些年来获得最快进展（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第 130 页）。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的分析，特别是第 85 页的表 4.1 表明，人类发展报告处是被这个受到它如此重视的指数误导而出了错。
- 具体来说，该处所认为对有些国家（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已获确立的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较强联系”仅反映了对这些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而言，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对“人类发展指数差距的缩减”百分率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一种循环论证。
- 相反，没有理由认定象巴基斯坦和埃及这种人类发展指数相对低的国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只有“较弱的联系”。正是这些国家，而不是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教育和预期寿命方面获得快速的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指数掩盖而不是揭示了各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相对进展。

48.1 人类发展报告处承认有错误，即表中的数据与正文中的说法不一致（见上面第 48 段第二点）。**这是我们建议应更严格地控制质量的另一个事例（见第 70 段建议 7）。**

48.2 卡斯尔斯先生的其他各点与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解和它与各个组成部分的统计资料的关系有关，因此可能不属于我们的任务范围。

48.3 人类发展报告处和卡斯尔斯先生都似乎过分强调与某项假设所预测的行为不符的个别事例。一般接受的统计做法要求在判断一项关系的正确性时，不能只看几个例子，而应分析足够数目的个例以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结论。

48.4 良好统计做法还要求，对于偏离了一项估计的关系的数据，要根据数据的质量加以审查。

五. 总结论

49. 《人类发展报告》是一份有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在所有联合国出版物中，该报告可能得到最多的媒体和大众注意。它所传达的讯息看来影响到各国和国际上的政策性活动。它所用的方法及统计数字被广泛采用，并影响国家发展报告的编制。

50. 该报告也是一份统计文件。尽管人类发展报告处说，它的意图并不是编写一份统计文件，但是读者们恐怕都将《人类发展报告》看作统计文件。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英文版）中，统计表几乎占了一半篇幅，正文中也到处散布着更多较小的表和各种各样的图。在许多情况下，政策建议和结论都是依据或自称依据这些统计资料提出来的。

51. 《人类发展报告》的读者群很大，读者身份各异，其中许多人不具备对文件中所载的统计资料作批评的经验或技术知识。这无意间造成了一种依赖和随之而来的信任。许多使用《人类发展报告》的人需要报告所载的数据或基于这些数据的资料，他们只好相信这些资料和数据真是它自己说的那样准确无误。

52. 总而言之，考虑到该报告读者多，有影响，并得到信任，这就给人类发展报告处加上了一个特殊的担子，要求它坚持良好统计做法的最高标准。

53. 人类发展报告处认识到了这一责任，并正在采取行动，从而可能提高今后的《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质量。具体地说：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 Sakiko Fukuda-Parr 在 2000 年 6 月 16 日给 Ian Macredie 的信中表示：

- **人类发展报告处正在审查《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统计数字的一般原则；**
- **人类发展报告处打算更积极地参加统计专业人员关于衡量人类发展问题的辩论。这将包括参加统计委员会和行政协调会小组委员会的会议；**

- 人类发展报告处正在对指标表的设计和最后格式、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以及在《人类发展报告》的叙述中使用统计数据等问题进行彻底的审查；
- 人类发展报告处正在设立一个统计咨询小组，每年两次在人类发展报告处工作周期的关键阶段举行会议；
- 人类发展报告处已任命欧洲经济委会前统计司司长 Tom Griffin 为高级统计顾问，就《人类发展报告》所有方面的统计问题，包括上文提到的新倡议，提供咨询。

此外，如上文第 44 段指出，人类发展报告处正在与教科文组织就如何计量教育状况的问题进行讨论。人类发展报告处与系列数据的主要提供者进行的工作联系肯定是有利的，应加以鼓励。

54. 本小组被要求编写一份报告。说明《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并集中讨论卡斯尔斯先生所撰写的会议室文件中提出的问题。鉴于本小组的职权范围只是评估《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因此，在卡斯尔斯先生的批评意见中，凡是本小组判断认为属于如何解释数据的问题，就不将其看作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55. 在那些我们认为属于我们职权范围的问题中，我们发现，卡斯尔斯先生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指出了实质性错误（关于实质性错误，见下文第 59 段）。有一些地方的数据选择不符合“适合于目的”的标准。最重要的是选择了美元来将国别统计数字转换成国际可比的数字，而不是使用购买力平价美元。这一基本问题影响到了整个《人类发展报告》，也是卡斯尔斯先生多项批评的根源。

56. 对于另一些批评，本小组的结论是，《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数据存在一些计算错误；例如，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妇女估计人数（见上文第 41 段）和预期活不到 60 岁的估计人数（见上文第 41 段）。

57. 编写《人类发展报告》需要运用多种专业知识，例如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等。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选一个不同的具体主题的做法，更增加了制作整套《人类发展报告》所需的专门知识范围。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对数据所做的计算或解释有误，原因看来是没有应用有关的专门知识。人类发展报告处目前正在采取步骤，通过一些咨询机制，来扩大审查《人类发展报告》草稿时所涉的专业范围，这些步骤肯定有助于减少这类错误。

58. 最后一点是，有些是简单的错误，如正文中的数字与附表中的数字不一致、标签错误（例如将“劳动力”写成“人口”）、打字错误等。

59. 所有各类错误可以分成实质性错误和非实质性错误两种。实质性错误会使读者对所讨论的问题产生根本上扭曲的印象，而非实质性错误则给读者造成略有错误、但基本上合乎事实的印象。卡斯尔斯先生指出并得到我们的证实的有几个错

误是实质性错误，例如，使用购买力平价而不是美元来换算，就会显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生活在最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拥有全世界 60% 至 65%（而不是 86%）的收入，拥有世界上最富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与拥有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相比是 16 比 1 而不是 74 比 1，这一差距并非确定地在扩大，而是略有波动。

60. 我们认为，人类发展报告处正在采取的步骤（见上文第 53 段），加上我们的具体建议，将提供一条合理的途径，避免数据选择和计算上的错误。避免数据不一致之类的简单错误的最好办法，是采用标准的文稿管理和质量控制程序。

61. 拥有相关专门知识的咨询机构，在避免我们所发现的大多数实质性错误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然而，咨询机构的有效性在于如何使用这类机构。在《人类发展报告》的构思阶段，它们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它们在减少错误方面的真正作用在于对实际草稿进行审查。无疑这将拉长文稿制作过程，所以需要在文稿的编写时间表上为这些审查留出时间。

62. 全面地看整个《人类发展报告》，并对我们能够证实的不足之处进行评估后，我们的结论是，这些错误没有对《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主要统计表的可信性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们希望看到，主要统计表与正文中以此为依据的内容之间有更强和透明的联系。此外，如果在正文中提出的说法所依据的不是列在主要统计表中的数据的话，按照良好的统计学和社会学做法，应提供这些说法的来源。**可信性取决于是否能确保基于经验的说法可予核实（见第 72 段，建议 9）。**

63. 最后，必须认知到，人类发展报告处每年编制《人类发展报告》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份大篇幅的复杂文件。由于每年选择一个不同的主题，所以每一份的文字和图表都不一样。每当源数据有修订，即使是标准的表也需要核对。报告译成 11 种语文，任何一个处理过多种语文的统计文件的人都可以理解如此大量翻译造成的额外质量控制困难。所有的质量控制工作只能由一个人员不多的单位在短期内进行，而这个单位的统计人员又非常少。我们认知到，为了尽量扩大《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影响，人类发展报告处要确保《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数据尽量及时。这是为了减少这些数据被在定稿与最后出版之间这段时间中所公布的更新的或订正的估计数所取代的情况。这就大大限制了用来核对和修改文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发展报告处必须在准确与及时之间作出最佳的权衡。为使这一权衡做到令人满意，人类发展报告处可能需要限制报告所处理的专题范围，或限制对每一个专题讨论的详细程度。

六. 建议

建议 1

64. 我们建议，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全部使用购买力平价美元作为比较生活水准的主要方式，因为它已经用在各项关键指数之中（第 16 至 30 段和第 34.3 段）。

建议 2

65. 我们建议，对国家的边际化作出定义，并拟定适当的统计指标，加以公布，以补充而不是替代购买力平价换算（第 28 和 30 段）。

建议 3

66. 我们建议，如果采用预测的话，文中应清楚地说明这类数据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较差的质量。我们还建议，在“《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说明”中向读者提供关于预测的推测性质的材料，并在正文内的适当地方提及这些材料（第 34.2 和 37 段）。

建议 4

67. 人类发展报告处应提供可比的时间系列（特别是对于一组固定的国家），以免读者从前后不一致的统计数字作出错误的推断。人类发展报告处的数据库现在已用光盘提供（对此我们热烈欢迎），当个别的使用者独立地取得系列数据进行分析时，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第 35 段）。

建议 5

68. 我们建议人类发展报告处将自己的专门知识与各个咨询/审查机构结合起来，确保将核实《人类发展报告》中所有材料所需的专门知识应用于报告草稿的审查。我们认识到，为了做到充分有效，有些专家审查须在文稿接近定稿的时候进行。这此可能需要修订文稿的编写时间表，以便进行这些审查（第 38.3、41、42.2 和 43 段）。

建议 6

69. 人类发展报告处与关键系列数据的提供者加强合作，就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具体数据集另外包含的专长和知识。我们建议设法建立这种合作（第 6、11、41、44.5 和 45.4 段）。

建议 7

70. 我们建议审查和加强人类发展报告处的文稿管理和质量控制程序。编制《人类发展报告》一类文件的统计机构的经验可能是有助益的（第 33.1、38.3、39、42.2、48.1 段以及其他段落）。

建议 8

71. 我们建议，在今后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要避免把文字写得在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之间引起任何可能的混淆。在存在各种各样衡量尺度的情况下，这样做尤其重要（第 33.2 段）。

建议 9

72. 我们建议，为所有以统计数据为依据的说法提供关于数据来源的资料。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有些说法所依据的数据既没有在主要的表或正文附表中列出，也没有提供数据的资料来源。这不符合良好的统计学和社会学做法，读者也无法核实这些说法的统计正确性，结果是失去可信性（第 35.1 和 62 段）。

附录一

卡斯尔斯先生的会议室文件

人们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每年编写的《人类发展报告》褒贬不一。

按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阿·森的说法，它是“了解和认识社会和经济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开发计划署新任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认为该报告是开发计划署“皇冠上的明珠”（1999 年的报告，第 v 页，英文页号，下同）。

但是经合组织经济学和统计学部前负责人戴维·亨德森最近把《1997 人类发展报告》说成是一份不真实地反映世界事务的“错误百出的文件”（“不真实的视角：开发计划署看世界”，载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类发展的事实和假象》，不定期论文系列 1/2000，即将出版）。亨德森针对《人类发展报告》的许多“夸大其词、漏洞缺陷和不实之词”，提到该报告“不负责任和非专业地处理统计证据”的问题，并提请注意我对《1998 人类发展报告》的评论（伊恩·卡斯尔斯，“错误估量各国情况：对《1998 人类发展报告》的评论”，载于 1998 年 12 月《人口与发展述评》第 24（4）期）。

本文是我的评论文章的续篇。它用许多事例说明《1999 人类发展报告》“非专业地处理统计证据”。这些事例表明该报告的统计资料不可信赖。我认为，专业统计工作者有义务向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公开这种情况。

1) 富国占世界产出的比例

“到 1990 年代后期，在收入最高的国家生活的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占有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86%……”（第 3 页，和第 2 页的图）。

- 1990 年代后期的正确数字是 60%–65%。1996 年贸发会议秘书处用人类发展报告处自己提供的数据估计，如果各国按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的高低排列，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比例 1960 年为 64.4%，1991 年为 63.7%（《最不发达国家：1996 年报告》，第 v 页）。
- 早期的《人类发展报告》突出地宣称，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70% 增加到 1980 年代后期的 80% 以上。不过，称这种比例现已达到 86% 的说法经不起推敲：由此推断世界人口的其余 80% 仅生产全球产出的 14%。

- 事实上，一个比这小一点的人口，按世界银行的定义生活在“低收入”和“下中收入”国家的占全世界 75% 的人口，在 1995 年生产了全世界 63% 的谷物和 81% 的块根和块茎作物，1997 年占商业能源产出的 44%（和消费的 38%）（世界银行，1995 年和 1997 年《世界发展指标》）。
- 据安格斯·麦迪逊的估计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资料，6 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土耳其）1997 年就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25% 以上。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更不用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余大部分国家）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

2) 穷国占世界产出的比例

“到 1990 年代后期……，[世界人口中]最底下的五分之一仅生产世界产出的 1%……”（第 3 页，和第 2 页的图）。

- 考虑到国家间一般价格水平的差别，最底下五分之一人口生产的产出现在占 4% 左右。据上述贸发会议的估计，1991 年为 3.6%。
- 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占世界人口约 10% 的“最不发达国家”（表 16，第 200 页）1997 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购买力平价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 15.7%（表 1，第 137 页）。
- 这意味着，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 20%”，即使其中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同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一样贫穷，其所生产肯定占全球国内总产值 3% 以上。

3) 富国和穷国间的差距

“当今全球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均现象已到了荒诞的地步。拥有世界最富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与拥有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1960 年为 30 比 1，1990 年增加到 60 比 1，而 1995 年再增加到 74 比 1”（第 104 至 105 页）。

- 这些说法第一次出现在《1992 人类发展报告》中，并已在前面所引述的贸发会议报告中受到批驳。
- 在随后几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国内总产值估计数表明，按国家平均值排列，最富五分之一和最穷五分之一之间的比例，1960 年为 12 比 1，1990 年为 18 比 1，1997 年为 16 比 1。
- 所有专家都同意，不计价格水平差别的估计数，不能用来正确地比较“生活水平”或“人类发展”。

- 不论怎么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数字是前后不一致的。1999 年报告的“概论”中说 74 比 1 的比例是 1997 年的(第 3 页),而在同份报告的正文部分却说是 1995 年的(第 105 页);但是在《1998 人类发展报告》中,1995 年的比例为 82 比 1。

4)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

“最不发达国家继续边缘化, 并因亚洲危机而加快了边缘化速度”(第 105 页)。

- 最不发达国家近几年的人类发展速度相差很大。
- 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世界经济展望: 1999 年 9 月》中发表的估计数显示, 作为一个整体, 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从绝对值看非常低)比“七国集团”(G7)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得快。2000 年, 即连续第六年, 也将是如此。考虑到据联合国估计最不发达国家总人口每年 2.5% 的增长, 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意味着, 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 1995 年增长 3.7% (G7 为 1.6%)、1996 年 3.1% (G7 为 2.3%)、1997 年 2.5% (G7 为 2.3%)、1998 年 2.0% (G7 为 1.7%)、1999 年 2.7% (G7 为 2.0%), 2000 年则为 2.8% (G7 为 1.9%)。
- 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 1985 至 1996 年之间, 最不发达国家总入学率在初等教育一级增加 48%, 在中等教育一级增加 55%, 在高等教育一级增加 70% (教科文组织《1998 年统计年鉴》, 第 2 至 12 页)。

5) 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按 1987 年美元计算)平均从 1990 年的 277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的 245 美元(表 6, 第 154 页)。

- 这些数字同世界银行的估计数或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不一致, 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都显示, 从 1990 至 1997 年, 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了 10% 以上。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显示 1990 年代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减少, 原因是人类发展报告处没有进行同类比较。他们计算的 1997 年平均数没有列入 1990 年平均数中计入的一个主要发达国家(苏丹)。由于 1997 年苏丹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是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数的 3 倍多(世界银行,《1999 年世界发展指标》, 表 4.1), 1997 年把该国排除在外造成了错误的比较。
- 1990 和 1997 年的国内总产值估计数都列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表 6 的 30 个最不发达国家, 如果用《人类发展报告》本身的数据, 它们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227 美元起在 1997 年有了增加。这些国家加上苏丹(用《人

类发展报告》关于该国人均国内总产值的估计数和世界银行的估计增长)的平均数从 1990 年 270 美元增加到 1997 年 297 美元(这同《世界经济展望》的估计数所显示的增长 10%相一致)。

6) “南亚”的产出增长率

“南亚”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1990 年 463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 432 美元(表 6, 第 154 页)。

- 这个比较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表 6 中列有 1990 年和 1997 年可比数字的所有“南亚”国家(即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在这期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都增加了。没有提供 1997 年数字的唯一主要国家(伊朗)在这期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也增加了(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1999 年 5 月》, 第 153 页)。6 个正数的平均数不可能是负数。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出现错误的原因还是没有进行同类比较: 1990 年的平均数中包括伊朗, 而 1997 年的平均数中却不包括伊朗。由于伊朗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特别是根据《人类发展报告》处采用的 1987 年汇率换算办法), 1997 年把伊朗排除在外降低了该年的平均数, 从而使比较失去意义。

7) “南亚(不包括印度)”的产出增长率

“南亚(不包括印度)”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1990 年的 709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的 327 美元(表 6, 第 154 页)。

- 在表 6 列出可比数字的 130 多个国家中, 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在 1990 至 1997 年期间减少一半。因此, 在一组总人口近 4 亿的国家中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减少。
- 实际上, 表 6 所示的 1990 至 1997 年南亚除印度外的其他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变动如下: 孟加拉国+22%; 马尔代夫+14%; 尼泊尔+18%; 巴基斯坦+15%; 和斯里兰卡+26%。
- 出现错误的原因又是没有进行同类比较: 伊朗列入了 1990 年的平均数, 但没有列入 1997 年的平均数。

8) 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安哥拉和科威特……[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可能降低 14%至 18%……。赞比亚……[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预计可能降低 9%”(第 40 页)。

- 1999年7月一份出版物发表的这些估计数，也见于题为“亚洲危机对遥远的经济体和人民造成伤害”的表1.3中（第41页）。
- 事实上，根据1999年4月20日发表的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5月》的资料，这些下降并没有发生。
- 《1999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安哥拉和委内瑞拉1998年的国内总产值分别下降18%和6%，而1999年4月公布的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数根本没有任何下降。《1999年度人发报告》中估计加蓬、尼日利亚、蒙古和智利1998年的国内总产值分别下降13%、4%、6%和3%，而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所有这些国家的国内总产值都增长了2%至4%。《1999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科威特和赞比亚分别下降14%和9%，而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是仅下降2%。

9) 1990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1990至1997年期间，[整个世界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以上”（第22页）。

- 这是大为低估的数字。1990至1997年期间，整个世界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2%（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10月》，第158页，和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数）。
- （按照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占世界人口77.5%的“发展中国家”，1990至1997年期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4.3%（货币基金组织，同上，第158页）；与此相比，在先前170年中，这些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在1%左右（安格斯·麦迪森，“经济进步：从历史角度回顾上半个世纪”，载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类发展的事实和假象》，不定期论文系列1/2000）。

10)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独联体的增长

“自1980年以来，有60个国家日渐变得越来越穷”（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的前言，第v页）。

- 署长似乎误解了报告正文中关于“59个国家——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独联体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第31页）的说法。
- 这一说法指的是1980至1996年整个期间的净变化率，它不能用来推断所有这些国家在这期间“日渐变得越来越穷”。恰恰相反，在1980至1997年期间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经历了5年或7年的增长（表6），并且在1995至1998年期间，其中大部分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增长（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10月》，第169至179页）。

- 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27 个“转型期国家”中有 21 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44 个国家中有 35 个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在 1995 至 1998 年期间都在增长（第 176 和 179 页）。

11) 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

“在受艾滋病毒感染人口占 10% 或以上的 9 个非洲国家，即博茨瓦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人口预期寿命预计到 2010 年会缩短 17 年，下降到 49 岁……”（第 42 页）

- 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艾滋病流行前达到 66 岁（49 岁加 17 岁）。
-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订正本》），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 61 岁，大多数国家的最高人均预期寿命都大大低于 61 岁。
- 这并不是否认艾滋病流行的极端严重性和联合国预测人口预期寿命缩短的重大意义。

12) 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妇女人数

“预期近 3.4 亿妇女活不到 40 岁”（第 22 页）。

- 联合国人口司估计，在 2000 年中期全世界 30.2 亿妇女中，有 22.8 亿年龄在 40 岁以下（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订正本》，第 11 页）。
- 在这 22.8 亿妇女中，预计 22 亿以上（占总数 96.5%）能活到 40 岁。（计算方法是把 2040 年为 40-44 岁、2035 年为 35-39 岁、2030 年为 30-34 岁及依此类推的妇女人数相加）。因此，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预期不能活到 40 岁的妇女人数不足 0.8 亿，而不是 3.4 亿。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文内的错误很可能归咎于表 4 有一栏的标题不正确（“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这导致编者把“全世界”活不到 40 岁的人口比例（12.5%）当作是整个妇女人口的比例。
- 事实上，全世界 5 岁以下男儿童死亡率都是 8.3%（世界卫生组织，《1999 世界卫生报告》，第 90 页）。因此，《人类发展报告》所给的不能从 0 岁活到 40 岁的 12.5% 比例意味着从 5 岁活到 40 岁的几率非常高。

13) 预期活不到 60 岁的人数

“预期约 15 亿人活不到 60 岁”（第 22 页）。

- 这是栏目标题不正确造成的又一起错误推论（表 5，“预期活不到 60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 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数意味着，现在活着但不能活到 60 岁的人数为 7.5 亿左右，不是 15 亿。

14) 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失业率

“[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失业”（第 32 页）。

- 工业国家劳动力中失业青年（20 至 24 岁）的比例为 16%，即六分之一左右（表 26，第 236 页）。
- 表 26 有一条脚注正确地指出“总”失业率同劳动力有关，但没有脚注所引述的青年失业率也是这样算的。
- 工业国家 15 至 24 岁青年的失业比例小于十分之一。

15) 南亚国家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

“在许多南亚国家，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 33% 以上……”（第 94 页）。

- 根据《1999 人类发展报告》本身的材料（表 12），1997 年农业占国内总产值达 33% 的南亚国家只有尼泊尔（41%）和不丹（38%）。这两个国家的人口不足南亚人口的 2%。
- 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农业占其国内总产值的 20% 至 25%。

16) 综合总入学比率：教科文组织数据的采用

“今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是根据……教科文组织关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总入学率的订正数据编制的”（第 128 页）。

- 表 TN1 关于总入学率的订正数据（第 164 至 166 页）造成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重大变化，原因是在《1998 人类发展报告》中，约有 50 个国家没有采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
- 除了某些例外（见下文），人类发展报告处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因此，是《人类发展报告》的决定而不是“订正数据”造成了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变动。

17) 总入学比率以 100% 为上限

《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没有采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和联合王国综合总入学比率。对这些国家，所报的比率，人类发展报告处用来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比率，都是以 100% 为上限（表 1，第 134 页）。

- 为这个比率设上限的决定表明该处不懂这些数字的根据。“总入学比率是不论年龄大小，入学接受某一级教育的学生人数……占正式学龄人数的百分比”（第 254 页，着重线为本文所加）。
- 在许多“高度人类发展国家”，有很多超过正式学龄的人入学就读，因此把其中有些入学比率下调是不合逻辑的。入学比率限定在上限的 4 个国家，其“超过正式学龄”的入学人数都多于没有入学的“正式学龄”人数。
- 如果人类发展报告处没有出这个错误，1999 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而不是加拿大。

18) 综合总入学比率：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

在性别发展指数表中和在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时，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芬兰、瑞典和联合王国女性综合总入学比率被定在上限，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男性综合总入学比率也被定在上限。

- 这种程序是不对的，原因与上文第 17 点说明的相同。
- 结果，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受到严重歪曲。例如，教科文组织所报的联合王国综合总入学比率女性为 109%，男性为 99%。但是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时，《1999 人类发展报告》所报的联合王国比率，女性为 100%，男性为 99%。
- 尽管联合王国入学的女性对男性比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但是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数值的依据却假定了有 47 个国家的女性对男性入学比率高于联合王国，这些国家是：加拿大、挪威、美国、瑞典、冰岛、法国、芬兰、丹麦、新西兰、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以色列、文莱达鲁萨兰国、葡萄牙、巴哈马、斯洛文尼亚、科威特、巴林、阿根廷、乌拉圭、卡塔尔、斯洛伐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匈牙利、委内瑞拉、巴拿马、爱沙尼亚、马来西亚、古巴、白俄罗斯、立陶宛、保加利亚、（西）萨摩亚、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洪都拉斯、纳米比亚、蒙古、尼加拉瓜、博茨瓦纳和莱索托。

19) 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的含义

“一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越接近于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它的性别差距就越小。但是每一个国家按性别发展指数都低于它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男女不平等。在 143 个国家中，有 43 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排名低于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这表明在培养妇女的能力方面同男子相比进展不均”（第 132 页）。

- 人类发展报告处误解了性别发展指数结果。性别发展指数不表示“在培养妇女的能力方面同男子相比”是否有“进展不均”或是相反的情况。

- 前几份报告曾评说，“任何一个社会对待妇女都没有对待男人那么好”（《1997 人类发展报告》，第 39 页），“在每一个国家，妇女的人类发展成就都不如男人”（《1998 人类发展报告》，第 31 页），这些说法都反映了类似的错误概念。
- 从表 2 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男女分列的指数。它们表明，例如在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女性指数高于男性指数。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妇女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男子，差别远大于人类发展报告处为了“计及妇女一般比男子寿命长这一事实”而采用的 5 年差别（第 160 页）。

20) 国内总产值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

“尽管贸易和增长之间存在强烈联系，但是同人类发展却没有必然联系……。埃及和巴基斯坦……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人均收入增长超过 3%，但是两国在人类发展方面还要走漫长的路。”

- 拿来与收入增长进行有意义比较的，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改善程度，而不是它的绝对水平。
- 事实上，埃及和巴基斯坦 1985 至 1997 年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并没有达到 3% 以上：用《1999 人类发展报告》本身提供的数据（表 6）推算，埃及的年增长率为 1.7%，巴基斯坦为 2.5%。
- 然而，这两国在 1985 年至 1997 年期间有快速的“人类发展”（按人类发展指数衡量）。《1999 人类发展报告》自己也把埃及排在印度尼西亚之后，列为“低度人类发展国家”中在这些年来获得最快进展（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第 130 页）。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的分析，特别是第 85 页的表 4.1，表明人类发展报告处是被这个受到它如此重视的指数误导而出了错。
- 具体来说，该处所认为对有些国家（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已获确立的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较强联系”，仅反映了对这些在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而言，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对“人类发展指数差距的缩减”百分率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一种循环论证。
- 相反，没有理由认定象巴基斯坦和埃及这种人类发展指数相对低的国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只有“较弱的联系”。正是这些国家，而不是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教育和预期寿命方面获得快速的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指数掩盖而不是揭示了各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相对进展。

附录二

人类发展报告处对卡斯尔斯先生会议室文件的回应

本月初卡斯尔斯先生在纽约举行的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散发一份没有签名的文件，其中对《1999 人类发展报告》使用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的问题提出诸多尖锐的批评。（虽然卡斯尔斯先生文件的题目是“1997 人类发展报告”，但是其内容却涉及《1999 人类发展报告》，而不是 1997 的报告）。这份拥有众多读者的报告每年由属于开发计划署但在编辑事务上独立的人类发展报告处编写。该报告出版 10 年来从崭新的角度分析并从统计上估量人类发展和人类贫穷的问题，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卡斯尔斯先生对这种相当普遍的看法不以为然，除了他自己的判断之外，他还引用戴维·亨德森先生的看法来支持他的论点，即《人类发展报告》有“夸大其词、漏洞缺陷和不实之词”的问题。这些说法值得认真审视。

在进行审视前应先说明一个一般性要点。任何试图提出国际数据的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料缺漏，有时还有数据的矛盾问题。这种情况开发计划署会遇到，设法应付当今世界上数据不完善问题的其他组织也会遇到。开发计划署非常了解《人类发展报告》的姐妹出版物——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大家庭的各种出版物所做的出色工作。它注意到其他组织如何解释当时所能获得的佐证材料的“平衡”。《人类发展报告》得出的经验结论，就如其他组织的经验判断一样可以受到批评和质疑；由于数据的问题，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编写报告并不是象卡斯尔斯先生看来设想的那样，要寻求某些不容置疑的、无法提出任何数据来反证的经验结论，而是提出在理解全部现有可得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强有力的结论。

抓住这个一般性要点，对于评估（下面就要审视的）卡斯尔斯先生的具体批评意见非常重要，因为他的通篇文章都暗含一种假设，即任何变量只要存在一个不同的估计数，就是彻底推翻了《人类发展报告》自己的估计数。《人类发展报告》的指导方针是，设法理解（不完整、有时还有点矛盾的）现有可得的经验证据，与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资料相比，更有助于负责任的公开讨论。这项基本战略的出发点是要避免那些同经验认识完全脱离的政策讨论。

开发计划署继续承诺全力竭尽所能，通过提供关于全世界人类发展状况、趋势和优先行动的最令人信服的情况，来启发公开的讨论。这并不否认我们有时会判断失误（事实上《人类发展报告》曾经多次订正它过去的结论），因此，我们欢迎对《人类发展报告》作出的一切认真批评。

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加强收集和分析人类发展数据的工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同主流经济指标相比，许多国家的社会指标较难得到、较不可靠、较

旧，处理也较慢。我们希望统计委员会及其在各国和国际上的伙伴优先注意这方面的不足。

本回应清楚地表明，卡斯尔斯先生提出的意见没有一条能改变报告所传达的信息。特别是，这些意见根本动摇不了报告的论点，即人民和国家的贫穷、不均以及需要加快人类发展等问题，依然是国际社会应予关注的重大政策问题。对于经济和统计上的判断问题（a），我们认为我们的判断没有错，并坚持《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卡斯尔斯先生提出的关于展示方式的问题（b），同时对其中的错误或打印错误（c+d）表示遗憾，并承诺予以纠正。在关于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指数的各点问题上（e），卡斯尔斯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早已为人类发展报告处所知道，且已不断加以审查。

* * *

卡斯尔斯先生的会议室文件提出了 20 点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 a. 属于经济或统计上的判断问题，而不是统计的客观性问题：1、2、3、4、8、9、20。
- b. 展示方式问题：5、6、7、14、15。
- c.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打字错误：11。
- d. 人类发展报告处对统计数据的解释错误：10、12、13、19。
- e. 与人类发展指数或其他指数的计算方法有关的问题：16、17、18。

其中有几点涉及到类似的问题。第 1、2 和 3 点涉及到计算收入份额的适当方式；第 5、6 和 7 点都涉及到如何更明确地展示区域收入的时间系列统计总值；第 12 和 13 点都涉及到估计预期活不到 40/60 岁的人数的技术性误差；第 17 和 18 点则都涉及到人类发展指数中如何处理总入学比率的问题。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完整答复每类之中的第一点问题，其后各点则只在提出新问题时才答复。

我们用以下的方式对 20 点问题逐一作出回应：首先是用**黑体字**抄录卡斯尔斯先生的原文，紧接着是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卡斯尔斯先生：

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

人们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每年编写的《人类发展报告》褒贬不一。

按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阿·森的说法，它是“了解和认识社会和经济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开发计划署新任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认为该报告是开发计划署“皇冠上的明珠”（1999 年的报告，第 v 页，（英文本页号，下同））

但是经合组织经济学和统计学部前负责人戴维·亨德森最近把《1997 人类发展报告》说成是一份不真实地反映世界事务的“错误百出的文件”（“不真实的角度的：开发计划署看世界”，载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类发展的事实和假象》，2000 年 1 月不定期论文系列，即将出版）。亨德森针对《人类发展报告》的许多“夸大其词、漏洞缺陷和不实之词”，提到该报告“不负责任和非专业地处理统计数据”的问题，并提请注意我对《1998 人发报告》的评论（伊恩·卡斯尔斯，“错误估量各国情况：对《1998 人类发展报告》的评论”，载于 1998 年 12 月《人口与发展述评》第 24（4）期）。

本文是我的评论文章的续篇。它用许多事例说明《1999 人类发展报告》“非专业地处理统计数据”。这些事例表明该报告的统计资料不可信赖。我认为，专业统计工作者有义务向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公开这种情况。

1) 富国占世界产出的比例

“到 1990 年代后期，在收入最高的国家生活的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入口，……占有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86%……”（第 3 页，和第 2 页的图）。

- 1990 年代后期的正确数字是 60%—65%。1996 年贸发会议秘书处用人类发展报告处自己提供的数据估计，如果各国按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的高低排列，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比例 1960 年为 64.4%，1991 年为 63.7%（《最不发达国家：1996 年报告》，第 v 页）。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卡斯尔斯先生所述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数字和人类发展报告处提出的数字之间的差别在于，贸发会议选用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而人类发展报告处则选用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哪一个正确是经济上的判断问题，而**不是**统计的客观性问题。为此，我们不同意卡斯尔斯先生那种以购买力平价美元代表“正确”数字的说法。理查德·乔利（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在（2000 年 3 月 2 日）统计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解释了我们选用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的理由。

“就象许多其他统计问题一样，这种统计问题没有单一的正确答案。什么最佳统计办法取决于所问的问题。对于评价相对生活水平，采用人均购

买力平价美元较好，因此，人类发展指数中把人均购买力平价美元估计数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对于评估国家的边际化问题，选用国内总产值（美元）往往比较合适，而在 1999 年，我们的主要主题之一是最贫穷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和全球议价能力关系中的边际化问题。例如，十多个最贫穷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世贸组织的主要谈判，其直接原因是在进行主要谈判的日内瓦维持一个代表团的费用。不用说，在日内瓦住旅馆和付薪金都必须用瑞士法郎，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美元。”

正如理查德·乔利强调的那样，《人类发展报告》向来接受以人均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作为比较相对生活水平的有效尺度。采用国内总产值（美元）有理论原因，而在使用购买力平价美元估计数方面还有重大的实际考虑。《1993 年联合国世界生产总值国际分布趋势》（联合国统计司，1993 年，第 25 至 26 页——英文本页号，下同）中说：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曲线图形同基于其他兑换率的曲线相比，显示的不均现象较少，其部分原因是购买力平价仅涉及 178 个国家中的 117 个。由于不包含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属于最富有的国家，并且其中好几个属于世界上较穷的那一半国家，世界生产总值中的不均现象看来就比较小了。”

问题不仅涉及所包含的范围，而且涉及质量。欧统处在讨论《人类发展报告》的同届会议上曾向统计委员会提出一份文件，其中指出现有购买力平价算法的一些质量和可能改进的方面。提到的方面有：需要提高及时性，提高列入同一组计算价格的产品之可比性，进一步提供培训以加强统一工作标准和最佳做法的运用，和需要寻找非市场服务（如政府开支）的产出估量办法（《提高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质量：欧统处的提议》）。

显然，在使用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时，缺少许多国家的可靠数据造成重大的实际问题。在编写《1999 人类发展报告》时，世界银行作为购买力平价国际估计数的一个主要来源，仅能够提供报告所涉 174 个国家中 140 个国家的数据。还有，趋势数据更难得到，也更不可靠。卡斯尔斯先生引用的贸发会议数字不可避免地只能以这些有限的购买力平价美元数据为根据。

鉴于在涉及不均现象的许多问题上采用购买力平价的局限性和采用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有种种实际和理论的理由，所以其他主要机构也采用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就毫不奇怪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就采用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来分配资金和进行国家分类。事实上，联合国在上述那份出版物中得出与《人类发展报告》非常类似的结果（第 38 页）：

“该表（表 7，第 37 页）清楚地表明世界生产总值分布不均的现象。在过去 20 年中，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四分之一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1.5% 至 2.7%，而最富有的四分之一却占了 80% 至 87%。”

卡斯尔斯先生：

- 早期的《人类发展报告》突出地宣称，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70% 增加到 1980 年代后期的 80% 以上。不过，称这种比例现已达到 86% 的说法经不起推敲：由此推断世界人口的其余 80% 仅生产全球产出的 14%。
- 事实上，一个比这小一点的人口群体，即按世界银行的定义生活在“低收入”和“下中收入”国家的占全世界 75% 的人口，在 1995 年生产了全世界 63% 的谷物和 81% 的块根和块茎作物，1997 年占商业能源产出的 44%（和消费的 38%）（世界银行，1995 年和 1997 年《世界发展指标》）。
- 据安格斯·麦迪逊的估计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资料，6 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土耳其）1997 年就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25% 以上。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更不用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余大部分国家）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这最后几点的重点是，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 80% 不可能只生产全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14%。然而，按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而**不是**按购买力平价美元估量，并采用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最贫穷 80% 人口的产值的确仅占全球产值的 14%。

针对最后两段的具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澄清这一点：

(1) 虽然 75% 的世界人口生产了数量可观的谷物、块根和块茎作物及商业能源，但是这些商品的价格并非由此决定。由于我们采用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所以在我们的计算中是用美国价格（而不是购买力平价美元价格）来算它们的价值。

(2) 事实上，按美元人均收入高低排列，有好几个发展中国家跻身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之列，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特区）香港、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塞舌尔、圣基茨和尼维斯、（中国）台湾和乌拉圭。

(3) 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土耳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美元）仅占全世界总值的 8%。（《1999 人类发展报告》，表 12——注：“全世界”总值只包含《人类发展报告》中有数据的 174 个国家）。

卡斯尔斯先生：

2) 穷国占世界产出的比例

“到 1990 年代后期……，[世界人口中]最底下的五分之一仅生产世界产出的 1%……”（第 3 页，和第 2 页的图）。

- 考虑到国家间一般价格水平的差别，最底下五分之一人口生产的产出现在占 4% 左右。据上述贸发会议的估计，1991 年为 3.6%。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第 1 点谈的是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占了全世界国内总产值的 86%，而这一点谈的是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仅占全世界产出的 1%。同第 1 点一样，同国内总产值（美元）来衡量产出，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确实只占全世界产出的 1%。

卡斯尔斯先生：

- 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占世界人口约 10% 的“最不发达国家”（表 16，第 200 页）1997 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购买力平价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 15.7%（表 1，第 137 页）。
- 这意味着，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 20%”，即使其中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同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一样贫穷，其所产肯定占全球国内总产值 3% 以上。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卡斯尔斯先生在计算中再次采用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而人类发展报告处采用的是国内总产值（美元）。采用国内总产值（美元）时，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不属于最底下五分之一，而有些非最不发达国家却跌入最贫穷的 20% 中。例如，印度是非最不发达国家，却占最贫穷 20% 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尼日利亚是又一个非最不发达国家，它另占最贫穷 20% 人口的 10%。因此，最不发达国家的合计人均国内总产值即使以美元计算，在这项计算也不是完全具有相关意义。

卡斯尔斯先生：

3) 富国和穷国间的差距

“当今全球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均现象已到了荒诞的地步。拥有世界最富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与拥有最贫穷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国内总产值）的差距 1960 年为 30 比 1，1990 年增加到 60 比 1，而 1995 年再增加到 74 比 1”（第 104 至 105 页）。

- 这些说法第一次出现在《1992 人类发展报告》中，并已在前面所引述的贸发会议的报告中受到批驳。
- 在随后几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国内总产值估计数表明，按国家平均值排列，最富五分之一和最穷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比例，1960 年为 12 比 1，1990 年为 18 比 1，1997 年为 16 比 1。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这也是因为卡斯尔斯先生采用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而不是国内总产值（美元）。贸发会议其实并没有“批驳”人类发展报告处的计算，就如统计司的出版物并没有证实这些计算一样。它们是不同的计算，各有不同目的。

卡斯尔斯先生：

- 所有专家都同意，不计价格水平差别的估计数，不能用来正确地比较“生活水平”或“人类发展”。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我们同意，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比国内总产值（美元）能更好地衡量“生活水平”。这一点理查德·乔利在（2000年3月2日）统计委员会中的发言也作了明确说明。

人类发展报告处认为，“全球不均现象”和全球“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到了荒诞的地步。例如，《1998 人类发展报告》就用肉类公斤数等消费品数量说明了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消费水平的差距。

卡斯尔斯先生：

- 不论怎么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数字是前后不一致的。1999年报告的“概论”中说74比1的比例是1997年的（第3页），而在同份报告的正文部分却说是1995年的（第105页）；但是在《1998 人类发展报告》中，1995年的比例为82比1。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有一个打字错误。第105页提到的年份应是1997年，而不是1995年。然而，《1998 人类发展报告》中关于1995年的数字是正确的。

卡斯尔斯先生：**4)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

“最不发达国家继续边缘化，并因亚洲危机而加快了边缘化速度”（第105页）。

- 最不发达国家近几年的人类发展速度相差很大。
- 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9月》中发表的估计数显示，作为一个整体，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从绝对值看非

常低)比“七国集团”(G-7)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得快。2000年,即连续第六年,也将是如此。考虑到据联合国估计最不发达国家总人口每年2.5%的增长,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数意味着,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1995年增长3.7%(G7为1.6%)、1996年3.1%(G7为2.3%)、1997年2.5%(G7为2.3%)、1998年2.0%(G7为1.7%)、1999年2.7%(G7为2.0%),2000年则为2.8%(G7为1.9%)。

- 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1985至1996年之间,最不发达国家总入学率在初等教育一级增加48%,在中等教育一级增加55%,在高等教育一级增加70%(教科文组织《1998年统计年鉴》,第2至第12页)。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人类发展报告》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许多穷国在世界经济中已被边缘化。统计数据常常被用来突出这个问题。例如,本文件中第1、2和3点概述的收入份额,或1980至1997年之间约60个国家人均收入的下降(见本文件第10点),或1997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占因特网用户90%以上(《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等等,例子不胜枚举。

尽管卡斯尔斯先生引用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近来的增长(及入学率增加),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许多穷国被边缘化的总体状况。可惜,所引述的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物(《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10月》)中没有提供人均国内总产值的水平,而只有增长率。不过,联合国的《1999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第261至264页)中提出与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数字。它们显示,1998年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2.8%，“发达经济体”则为2%。用这些增长率,结合1998年的人均实际国内总产值水平(以1993年美元计算),即最不发达国家258美元、发达经济体国家为25649美元,最不发达国家要花近600年才能赶上来。

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边缘化观点并不是一家之言:

“经过20年几乎连续的经济衰退后,非洲现在开始复苏……。然而,即使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能在未来10年中保持过去3年的增长,也还不能扭转该区域的边缘化……,最多只能弥补过去20年的所失。”(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1998年贸易与发展报告》(英文本第XI页))

边缘化“因亚洲危机而加快”的论点所根据的理论是,亚洲危机造成世界贸易减少,从而导致许多穷国的贸易条件恶化。第1章(第41页)中用一些统计例证概述了这个论点。这些例证包括出自贸发会议《199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的数据(第42至45页,本文件中第8点中也提到)的数据。

贸发会议概述了世界贸易减少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出口价格、出口收入和最终对国内总产值的影响，预计受冲击特别大的是初级产品生产国和相对于经济规模来说出口部门较大的国家。

历史显示，亚洲危机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当时预测的那么严重。卡斯尔斯先生提到的出版物发表得太晚，《1999 人类发展报告》无法把它列入，因为最后改动期限是 1999 年 3 月。

不论怎么说，卡斯尔斯先生从《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引用的那句话陈述了事实和因果关系，只是没有同时用统计证据加以证明。这个论点应该与对亚洲危机所作的其他分析一起放在提供了统计证据的第 1 章。第 1 章中的分析是这个论点的基础，但是还远未能充分把握亚洲危机的复杂性和预期的影响。

卡斯尔斯先生：

5) 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按 1987 年美元计算)平均从 1990 年的 277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的 245 美元(表 6, 第 154 页)。

- 这些数字同世界银行的估计数或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不一致，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都显示，从 1990 到 1997 年，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了 10% 以上。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显示 1990 年代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减少，原因是人类发展报告处没有进行同类比较。他们计算的 1997 年平均数没有列入 1990 年平均数中计入的一个主要发达国家(苏丹)。由于 1997 年苏丹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是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数的 3 倍多(世界银行，《1999 年世界发展指标》，表 4.1)，1997 年把该国排除在外造成了错误的比较。
- 1990 和 1997 年的国内总产值估计数都列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表 6 的 30 个最不发达国家，如果用《人类发展报告》本身的数据，它们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227 美元起在 1997 年有了增加。这些国家加上苏丹(用《人类发展报告》关于该国人均国内总产值的估计数和世界银行的估计增长)的平均数从 1990 年 270 美元增加到 1997 年 297 美元(这同《世界经济展望》的估计数所显示的 10% 增长相一致)。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卡斯尔斯先生提及的是载于表 6 底部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合计数。报告文内未用这些合计数作出推断。实际上，应避免根据这些合计数作出任何趋势评估，就因为如该表显示以及如卡斯尔斯先生指出的，1990 年比 1997 年有更多个国家的数据。

然而，虽然从该表本身可清楚看出，不同年份的数据涉及不同的国家组合，但本来可以更清楚地用脚注说明，以避免混淆。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用（未提供的）估计数代替欠缺的数据来编制合计数。《2000 人类发展报告》正在同世界银行（国内总产值数据的来源）合作，提供包括以估计数代替欠缺数据的合计数。

卡斯尔斯先生：

6) “南亚”的产出增长率

“南亚”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1990 年 463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 432 美元（表 6，第 154 页）。

- 这个比较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表 6 中列有 1990 年和 1997 年可比数字的所有“南亚”国家（即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在这期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都增加了。没有提供 1997 年数字的唯一主要国家（伊朗）在这期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也增加了（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5 月》：第 153 页）。6 个正数的平均数不可能是负数。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出现错误的原因还是没有进行同类比较：1990 年的平均数中包括伊朗，而 1997 年的平均数中却不包括伊朗。由于伊朗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特别是根据人类发展报告处采用的 1987 年汇率折算办法），1997 年把伊朗排除在外降低了该年的平均数，从而使比较失去意义。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这与第 5 点所述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讲的是“南亚”区域。这些数字也只出现在合计数中，人类发展报告处没有用来作出推断。

卡斯尔斯先生：

7) “南亚（不包括印度）”的产出增长率

“南亚（不包括印度）”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从 1990 年的 709 美元减少到 1997 年的 327 美元（表 6，第 154 页）。

- 在表 6 列出可比数字的 130 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在 1990 至 1997 年期间减少一半。因此，在一组总人口近 4 亿的国家中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减少。
- 实际上，表 6 所示的 1990 至 1997 年南亚除印度外的其他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数变动如下：孟加拉国 \downarrow 22%；马尔代夫 14%；尼泊尔 18%；巴基斯坦 \downarrow 15%；斯里兰卡 \downarrow 26%。

- 出现错误的原因又是没有进行同类比较：伊朗列入了 1990 年的平均数，但没有列入 1997 年的平均数。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这与第 5 点和第 6 点所述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讲的是“南亚(不包括印度)”区域。人类发展报告处也没有用这些合计数作出推断。

卡斯尔斯先生：

8) 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安哥拉和科威特……[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可能降低 14%至 18%……。赞比亚……[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预计可能降低 9%”（第 40 页）。

- 1999 年 7 月一份出版物发表的这些估计数，也见于题为“亚洲危机对遥远的经济体和人民造成伤害”的表 1.3 中（第 41 页）。
- 事实上，根据 1999 年 4 月 20 日发表的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5 月》的资料，这些下降并没有发生。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安哥拉和委内瑞拉 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分别下降 18%和 6%，而 1999 年 4 月公布的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数根本没有任何下降。《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加蓬、尼日利亚、蒙古和智利 1998 年的国内总产值分别下降 13%、4%、6%和 3%，而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所有这些国家的国内总产值都增长了 2%至 4%。《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科威特和赞比亚分别下降 14%和 9%，而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是仅下降 2%。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1999 人类发展报告》是在 7 月中旬推出，所以 3 月底就要付印。因此，在 3 月以后才得到的任何出版物，例如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5 月》，都用不上了。应当记住的是，在起草《1999 人类发展报告》的时候，东亚金融危机仍未过去，人们热烈辩论它蔓延到其他区域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较长期影响。许多组织都在作出估计和预测，并且经常加以修订。一个较少受到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对那些不是直接受到资金流动影响，但仍会受到波及的国家来说，它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国际资金流动不是只有“大主角”才关心，而是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人类发展报告》因此指出可能对最穷的国家产生的影响，并引用了贸发会议一项研究报告的数据，该研究报告刊登在几个月前发表的《1998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1999 人类发报告》清楚表明这些只是预测。

亚洲危机的估计影响随着时间和不同的出版物而异的事实，也反映在卡斯尔斯先生引述的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物（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5月》，第vii页）中，它说：

“《世界经济发展》提出的预测采用了一些假设……这些当然是工作假设而非预报，围绕着它们的不确定性扩大了误差幅度，这是无论什么预测都一定会有的。”

卡斯尔斯先生：

9) 1990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1990至1997年期间，[整个世界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以上”（第22页）。

- 这是大为低估的数字。1990至1997年期间，整个世界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2%（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10月》，第158页，和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数）。

人发报告处的回应：

全世界国内总产值的主要数据来源有差异。

所引的货币基金组织来源显示，从1991到1997年（1990年没有年度数据），世界产出（实际国内总产值）平均增长3.3%。在同一期间，全世界平均每年人口增长1.3%（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注：这些可能不是同一组国家的数据）。这意味着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2%。

但是其他来源给出不同的结果。

(1) 世界银行的《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CD-ROM，所给的1990至1997年实际国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是每年2.4%，同一期间每年人口增长1.5%；这意味着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为0.9%。

(2) 联合国的《1999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所给的1991至1998年期间世界产出年平均增长率是2.4%，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则增加到3%（第4页）。采用它们对同期间人口增长的估计数1.4%（第261页），则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和1.6%。（注：这里采用1991年至1998年而不是1990至1997年，因为这是联合国出版物提出有关数据的期间）。

考虑到得自不同来源的不同估计数之间的差异，以及构成“世界”的国家组合不同，《人类发展报告》关于全球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超过1%”的说法似乎与不确定的统计证据并非不一致。

卡斯尔斯先生：

- （按照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占世界人口 77.5% 的“发展中国家”，至 1997 年期间的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4.3%（货币基金组织，同上，第 158 页）；与此相比，前 170 年中，这些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在 1% 左右（安格斯·麦迪森，“经济进步：从历史角度回顾上半个世纪”，载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类发展的事实和假象》，不定期论文系列 1/2000）。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我们那句话说的是全球平均数。虽然平均数的组成部分可能有很大差异，但整个平均数仍然是对的。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显然也会随着来源而不同（例如，《1999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对它们所称的“发展中经济体”给出的 1991 至 1998 年实际人均国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是 3.6%）。

卡斯尔斯先生引述麦迪森文件的理由不清楚。这份文件并未提供给人类发展报告处。

卡斯尔斯先生：

10)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独联体的增长

“自 1980 年以来，有 60 个国家日渐变得越来越穷”（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的前言，第 V 页）。

- 署长似乎误解了报告正文中关于“59 个国家——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独联体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第 31 页）的说法。
- 这一说法指的是 1980 至 1996 年整个期间的净变化率，它不能用来推断所有这些国家在这期间“日渐变得越来越穷”恰恰相反，在 1980 至 1997 年期间，这些国家中有许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经历了 5 年或 7 年的增长（表 6），并且在 1995 至 1998 年期间，其中大部分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增长（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 年 10 月》，第 169 至 179 页）。
- 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27 个“转型期国家”中有 21 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44 个国家中有 35 个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5 至 1998 年期间都在增长（第 176 和 179 页）。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日渐”这个词显然是用错了。然而，马洛赫·布朗先生的观点比这个词大得多，值得强调他的话的全文：

“我完全同意作者们[关于市场赋予权力的作用]的是，这种赋予权力是不均匀的——它使某些国家、区域、族裔群体、宗教群体、阶级和经济部门

在不均现象更严重的情况下受到损害。自 1980 年以来，有 60 个国家日渐变得越来越穷。”

虽然“日渐”这个词不正确，但这句话表明了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重要问题。约 60 个国家的人均国产总值比 17 年前低这一事实意义重大。要记得，这是从本来就 very 低的起始水平的下降。

如卡斯尔斯先生指出的。《1999 人类发展报告》正文（第 31 页）中的较详细讨论并未提出这种说法。

卡斯尔斯先生：

11) 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

“在受艾滋病毒感染人口占 10% 或以上的 9 个非洲国家，即博茨瓦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人口预期寿命预计到 2010 年会缩短 17 年，下降到 49 岁……”（第 42 页）。

- 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艾滋病流行前达到 66 岁（49 岁加 17 岁）。
-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订正本》），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 61 岁，大多数国家的最高平均预期寿命都大大低于 61 岁。
- 这并不是否认艾滋病流行的极端严重性和联合国预测人口预期寿命缩短的重大意义。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人类发展报告》引述《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订正本》第一册《联合国人口司，1999 年第 4 页》说，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将缩短 17 岁，这没有错。错误是说预期寿命到 2010 年底会降到 47 岁（不是卡斯尔斯先生引述的 49 岁）。事实上，预期寿命 47 岁是指较早的 1995 至 2000 年期间，是对其估计预期寿命受到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影响的所有 29 个国家而言。

如卡斯尔斯先生在他最后一小段中指出的，从这个数据作出的推论，即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并不因搞错了 47 岁预期寿命的期间而有改变。

卡斯尔斯先生：

12) 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妇女人数

“预期近 3.4 亿妇女活不到 40 岁”（第 22 页）。

- 联合国人口司估计，在 2000 年中期全世界 30.2 亿妇女中，有 22.8 亿年龄在 40 岁以下（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订正本》，第 11 页）。
- 在这 22.8 亿妇女中，预计 22 亿以上（占总数 96.5%）能活到 40 岁。（计算方法是把预测 2040 年为 40-44 岁、2035 年为 35-39 岁、2030 年为 30-34 岁及依此类推的妇女人数相加）。因此，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预期不能活到 40 岁的妇女人数不足 0.8 亿，而不是 3.4 亿。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文内的错误很可能归咎于表 4 有一栏的标题不正确（“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这导致编者把“全世界“活不到 40 岁的人口比例（12.5%）当作是整个妇女人口的比例。
- 事实上，全世界 5 岁以下男儿童死亡率都是 8.3%（世界卫生组织，《1999 世界卫生报告》，第 90 页）。因此，《人类发展报告》所给的不能从 0 岁活到 40 岁的 12.5% 比例意味着从 5 岁活到 40 岁的几率非常高。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1999 人类发展报告》引用的数字是对该变数的错误理解。如卡斯尔斯先生指出的，该变数标示错了，被误作是对世界人口（这是指的是妇女人口而言）。事实上，该变数代表的是在假定今日的特定年龄死亡率形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今日出生的人活不到 49 岁的几率。它是一种虚构的估量，不能直接用来对人口作出多少人会在 0 岁到 40 岁之间死亡的有效估计。

为了估计今日在 40 岁以下的人当中未达到 40 岁就死亡的人数，可以根据预测未来各年不同的特定年龄死亡率推算，每个年龄组群（就是 0-4、5-9、10-14、……、35-39）有多少人能活着进入 40-44 年龄组。这意味着 2000 年年中的 0-4 年龄组女童人数应同 2040 年的 40-44 年龄组妇女人数比较；5-9 年龄组女童人数应同 2035 年的 40-44 年龄组妇女人数比较；并依此类推。所以，可以将 2005、2010、2015、2020、2025、2030、2035、2040 各年的 40-44 年龄组妇女人数加起来，拿来同 2000 年的 0-40 岁女性总人数比较。

这似乎是卡斯尔斯先生的本意。然而，卡斯尔斯先生不是如上面所述将不同年龄组活到 40-44 岁的妇女人数加起来，而是将同一个年龄组群（2000 年的 0-4 岁组群）活到不同时间点的人数加起来，拿来同 2000 年的 0-40 岁女性总人数比较。这也不是估计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妇女人数的有效方法。

卡斯尔斯先生：

13) 预期活不到 60 岁的人数

“预期约 15 亿人活不到 60 岁”（第 22 页）。

- 这是栏目标题不正确造成的又一起错误推论（表 5，“预期活不到 60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 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数意味着现在活着但不能活到 60 岁的人数为 7.5 亿左右，不是 15 亿。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这个问题同第 12 点讲的完全一样，因此回应也一样。

卡斯尔斯先生：

14) 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失业率

“[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失业”（第 32 页）。

- 工业国家劳动力中失业青年（20 至 24 岁）的比例为 16%，即六分之一左右（表 26，第 236 页）。
- 表 26 有一条脚注正确地指出，“总”失业率同劳动力有关，但没有脚注说所引述的青年失业率也是这样算的。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卡斯尔斯先生正确地指出，第 32 页与表 26 两者不一致（尽管指数所指的是 15 至 24 岁的人，而不是卡斯尔斯先生所说的 20 至 24 岁）。事实上，所说的有五分之一青年失业，指的是欧洲联盟，而不是经合组织。这是疏忽所致的编辑错误。

他还正确地指出，表 26 没有阐明“青年失业率”定义脚注。然而，在“统计术语定义”中已对此有所阐明。

卡斯尔斯先生：

15) 南亚国家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

“在许多南亚国家，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 33% 以上……”（第 94 页）。

- 根据《1999 人类发展报告》本身的材料（表 12），1997 年农业占国内总产值达 33% 的南亚国家只有尼泊尔（41%）和不丹（38%）。这两个国家的人口不足南亚人口的 2%。
- 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农业占其国内总产值的 20% 至 25%。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第 94 页那句话与表 12 不符。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有数据的 6 个南亚国家中，仅有两个国家的农业部门在 1997 年占国内总产值的 33%；平均数是 25%。

这里的要点是，农业部门对税收的贡献不够，仅为6%与表12的不一致，并不改变这些结论。

卡斯尔斯先生：

16) 综合总入学比率：教科文组织数据的采用

“今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是根据……教科文组织关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总入学率的订正数据编制的”（第128页）。

- 表TN1关于总入学率的订正数据（第164页至166页）造成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重大变化，原因是在《1998人类发展报告》中，约有50个国家没有采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
- 除了某些例外（见下文），人类发展报告处在《1999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因此，是《人类发展报告》的决定而不是“订正数据”造成了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变动。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1999人类发展报告》中排名的变化，是由纳入人类发展指数的全部4个因素——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总入学率和收入的“订正”数据所造成的。排名中最大的变化，是因处理收入的订正方法所造成的。

第128页和第159至167页关于方法和数据的讨论对这些订正作了充分说明。1998年没有采用教科文组织的订正数据，是由于我们未能考虑到教科文组织对一些数据的订正。如教科文组织在统计委员会上指出，在最近几次会议上，已直接与他们充分讨论了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还就教科文组织向我们提供的数据的所有方面与他们进行密切合作，因而从中获益。

卡斯尔斯先生：

17) 总入学比率以100%为上限

《1999人类发展报告》中没有采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和联合王国综合总入学比率。对这些国家所报的比率，即人类发展报告处用来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比率，都是以100%为上限（表1，第134页）。

- 为这个比率设上限的决定表明该处不懂这些数字的根据。“总入学比率是不论年龄大小，入学接受某一级教育的学生人数占……正式学龄人数的百分比”（第254页，着重线为本文所加）。
- 在许多“高度人类发展国家”，有很多超过正式学龄的人入学就读，因此把其中有些入学比率下调是不合逻辑的。入学比率被定在上限的4个国家，其“超过正式学龄”的入学人数都多于没有入学的“正式学龄”人数。

- 如果人类发展报告处没有出这个错误，1999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而不是加拿大。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决定总入学率以 100% 为上限，是由于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把入学率标杆定为 100%。这一决定绝不是旨在修订所提供的估计数，也不是对超过 100% 的估计数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计算人类发展指数（以及性别发展指数）的公式，是基于用来衡量指数的所有组成部分的成绩标杆。由于入学率的标杆是 0% 和 100%，因此高于 100% 的入学率成绩不再计算。对于预期寿命、识字率和收入也是一样，分别超过 85 岁、100% 和 4 万美元的成绩不再计算。

公式作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人类发展报告处对总入学率的误解，也不是怀疑教科文组织向我们提供的数据。一些国家超过标杆的情况是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在审查人类发展指数方法所用的标杆的范围内来处理。

在《1996 人类发展报告》中出现了第一个入学率超过 100% 的国家——加拿大。自《1996 人类发展报告》以来，入学率超过 100% 的国家数目慢慢增加。在《1999 人类发展报告》中，现在有 4 个国家在人类发展指数中超过 100%（有 8 个在性别发展指数中超过 100%，见第 18 点）。

尽管事实上这一调整只适用于很少数的国家，但人类发展报告处仍在继续不断地审查这一问题。事实上，关于预期寿命和收入的标杆很快也要加以审查了。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政策是不要每年都改变方法，而是将我们的各种改变集中在一起（如同《1999 人类发展报告》那样）。因此，我们计划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同时审查与人类发展指数有关的所有方法问题，其中包括各项标杆。知识这一组成部分将不仅考虑其标杆。在最近一些会议上曾请教科文组织提出一些拟订新的教育指标的想法供我们审议，以便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予以讨论。

卡斯尔斯先生：

18) 综合总入学比率：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

在性别发展指数表中和在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时，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芬兰、瑞典和联合王国女性综合总入学比率被定在上限，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男性综合总入学比率也被定在上限。

- 这种程序是不对的，原因与上文第 17 点说明的相同。
- 结果，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受到严重歪曲。例如，教科文组织所报的联合王国综合总入学比率女性为 109%，男性为 99%。但是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时《1999 人类发展报告》所报的联合王国比率，女性为 100%，男性为 99%。

- 尽管联合王国入学的女性对男性比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但是计算性别发展指数数值的依据却假定了有 47 个国家的女性对男性入学比率高于联合王国，这些国家是：加拿大、挪威、美国、瑞典、冰岛、法国、芬兰、丹麦、新西兰、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以色列、文莱达鲁萨兰国、葡萄牙、巴哈马、斯洛文尼亚、科威特、巴林、阿根廷、乌拉圭、卡塔尔、斯洛伐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匈牙利、委内瑞拉、巴拿马、爱沙尼亚、马来西亚、古巴、白俄罗斯、立陶宛、保加利亚、(西)萨摩亚、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洪都拉斯、纳米比亚、蒙古、尼加拉瓜、博茨瓦纳和莱索托。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这一点与第 17 点所述的相同，只是针对性别发展指数，而不是人类发展指数。上文已概述了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联合王国与上面所列的 47 个国家在入学率方面的比较有所失真，但这并不表示这 47 个国家之间的比较有所失真。

卡斯尔斯先生：

19) 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的含义

“一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越接近于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它的性别差距就越小。但是每一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都低于它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男女不平等。在 143 个国家中，有 43 个国家的性别发展指数排名低于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这表明在培养妇女的能力方面同男子相比进展不均”（第 132 页）。

- 人类发展报告处误解了性别发展指数结果。性别发展指数并不表示“在培养妇女的能力方面同男子相比”是否有“进展不均”或是相反的情况。
- 前几份报告曾评说，“任何一个社会对待妇女都没有对待男人那么好”（《1997 人类发展报告》，第 39 页），“在每一个国家，妇女的人类发展成就都不如男人”（《1998 人类发展报告》，第 31 页），这些说法都反映了类似的错误概念。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性别发展指数如其名称所示，反映的是性别的不平等，而不是不平等倾向于哪一方。

《人类发展报告》的说法假定了在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地方，妇女通常为受歧视的群体。尽管这不能直接由性别发展指数表现出来，但在所列举 43 个国家中

的 32 个，除预期寿命之外，性别发展指数所有组成部分的妇女情况都比较差，表明这一说法的一般推断是正确的。

卡斯尔斯先生：

- 从表 2 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男女分列的指数。它们表明，在例如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女性指数高于男性指数。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妇女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男子，差别远大于人类发展报告处为了“计及妇女一般比男子寿命长这一事实”而采用的 5 年差别（第 160 页）。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尽管这一小段并未对我们使用统计资料的方式提出质疑，但可对卡斯尔斯先生依据表 2（第 140 页）的数据算出来的男女分列指数作出两点评论。

(1) 虽然卡斯尔斯先生引用的指数表明了男女分别实现的人类发展平均水平，但它们未考虑到社会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反感。性别发展指数特别包含这种对不平等现象的反感，使它成为更全面地反映社会上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指数。这种对不平等现象的反感应该占多少份量，显然是一个主观的问题，而不是统计客观性的问题。

(2) 卡斯尔斯先生所说的“人类发展报告处为了‘计及妇女一般比男子寿命长这一事实’而采用的 5 年差别”，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性别发展指数中的男女预期寿命差别是以 5 年为上限。但情况并非如此。男女预期寿命的标杆定为相隔 5 年（上限是妇女 87.5 岁、男子 82.5 岁，下限是妇女 27.5 岁、男子 22.5 岁），以便考虑到妇女一般比男子寿命长这一事实。

卡斯尔斯先生：

20) 国内总产值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

“尽管贸易和增长之间存在强烈联系，但是同人类发展却没有必然联系……。埃及和巴基斯坦……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人均收入增长超过 3%，但是两国在人类发展方面还要走漫长的路。”

- 拿来与收入增长进行有意义比较的，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改善程度，而不是它的绝对水平。
- 事实上，埃及和巴基斯坦 1985 至 1997 年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并没有达到 3% 以上：《用 1999 人类发展报告》本身提供的数据（表 6）推算，埃及的年增长率为 1.7%，巴基斯坦为 2.5%。
- 然而，这两国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快速的“人类发展”（按人类发展指数衡量）。《1999 人类发展报告》自己也把埃及排在印度尼西亚之后，列为“低

度人类发展”国家中在这些年来获得最快进展（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第 130 页）。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在对同一个有限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作比较时，要在收入的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的进展两者之间进行比较才有意义。然而，对于一个国家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实现的收入增长（如同本实例那样），对照其经济增长来考虑人类发展的绝对值肯定也是恰当可取的。在这样的增长期之后，人们可以期望人类发展达到很高的绝对水平，不然人们就会得出结论，增长的效益没有充分地体现在人民的生活之中。

因此，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还要走漫长的路”的说法，并不与一个国家可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迅速进展的事实相矛盾；迅速的进展显然并不意味着“目标”已经达到。尽管埃及事实上在低度人类发展国家 1975 至 1997 年期间的进展速度中名列第二（按差距缩小率计算），但其人类发展指标只有 0.616，在《人类发展报告》的世界排名中占第 120 位。特别是巴基斯坦，它仅略高于“低度人类发展”的水平。（《199 人类发展报告》）

卡斯尔斯先生正确地指出了埃及和巴基斯坦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的增长率不符合事实。1975 至 1997 年期间，该两国的增长率分别为 3.6% 和 2.9%（第 157 页表 7）。因此，文中的数据所指的，看来是一个不同的更长时期的数据。数据的不准确令人遗憾，使文中概述的问题混淆不清。然而，如果使用正确数据的话，为这些国家作出的基本推断或许会更有力。虽然埃及和巴基斯坦在 22 年期间的增长率分别为 3.6% 和 2.9%，但它们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仅为 0.616 和 0.508。据此，显然可以说，尽管有着长期的迅速增长，但是“两国在人类发展方面还要走漫长的路”。

卡斯尔斯先生：

- 《1999 人类发展报告》的分析，特别是第 85 页的表 4.1，表明人类发展报告处是被这个受到它如此重视的指数误导而出了错。
- 具体来说，该处所认为对有些国家（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已获确立的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较强联系”，仅反映了对这些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而言，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对“人类发展指数差距的缩减”百分率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一种循环论证。
- 相反，没有理由认定象巴基斯坦和埃及这种人类发展指数相对低的国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只有“较弱的联系”。正是这些国家，而不是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在 1985 至 1997 年期间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教育和预期寿命方面

获得快速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指数掩盖而不是揭示了各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相对进展。

人类发展报告处的回应：

在考虑这些评论时必须铭记三点。第一，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收入只是其中三分之一。第二，收入是以对数形式处理的，因此在较高的水平对人类发展指数产生的影响较小。第三，这项分析不是针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而是针对人类发展指数差距缩小率的变化。

虽然在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之间作比较一定会有某种相关性，但这种分析不是一定得出自己在绕圈子的结果。具体而言，在对经济增长率良好但人类发展成绩各不相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增长的影响是受到有效控制的。文中那些简单的例证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虽然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良好，但其人类发展指标差距并不是都得到大大缩小。

就新加坡和香港（中国特区）而言，它们的人均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增幅很大，人类发展指数的其他组成部分也显著增长。香港（中国特区）在1985至1997年期间在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总入学率方面的差距分别缩小28%、39%和7%。同一时期内，新加坡的这些指标的差距也缩小了35%、40%和33%（这是人类发展报告处计算1985至1997年人类发展指数趋势时采用的数据）。

从来没有断言，在人类发展指数相对低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联系较弱。此外，从来没有将埃及的进展与其增长率作比较，也没有把它当作有这种较弱联系的国家例子。被认为有这种较弱联系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和乌干达。如所提及的表所示（《1999人类发展报告》第85页），巴基斯坦和乌干达1985至1997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距分别缩小17%和5%。而香港（中国特区）和新加坡则为45%和33%。

就非收入的组成部分而言，香港（中国特区）和新加坡在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总入学率方面的差距分别缩小28%、39%、7%和35%、40%、33%。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的这些组成部分的差距则分别缩小23%、17%、26%和-8%、27%、3%。这显然表明乌干达的成绩甚差，新加坡则比巴基斯坦和乌干达两者都出色。然而，在非收入的组成部分，香港（特区）与巴基斯坦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详尽的分列数据表明，巴基斯坦并不是有较弱联系的国家明确例子。

由于人类发展指数是代表人类发展成绩的一个综合数字，所以用它来衡量进展，只能提供关于人类发展指数各个组成部分的平均进展情况的资料。人类发展报告处一向认为，为了更详细地反映人类发展的成绩，必须个别地考虑各项人类发展指标。